

Awareness of War Towards the Japanese Invasion in Hong Kong Society

During the Period 1937-1941

1937 至 1941 年間香港社會對日本侵略的戰爭意識

by

TANG FAI CHING

P.G.D.E., B.A.(Hons.), A.A., HKBU

A dissertation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of Master of Arts at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ugust 2009



摘要

《1937 至 1941 年間香港社會對日本侵略的戰爭意識》一論文，乃為筆者鄧輝澄先生於 2009 年，繳交給香港大學作為文學碩士課程修業之用。

本論文著重研究的，是由 1937 年 7 月「七七事變」爆發到 1941 年 12 月「香港保衛戰」爆發期間，香港社會對日本侵略的戰爭意識。筆者要強調的是，所謂「日本侵略的戰爭意識」，是指社會對日本揮軍入侵香港的意識，而不是日本侵華的救國意識。至於日本侵華的救國意識，筆者會以「抗日救國」意識以形容之。

在研究「香港保衛戰」保衛戰這個課題時，不少學者主要集中於港府當局的防務部署以及軍事失誤方面，研究港府迅速敗陣的原因。但筆者之愚見認為，學者從防務部署、軍事失誤方面等著手研究時，通常只重於利用戰時官方的文獻，特別英軍軍官的日記為資料。筆者曾經拜讀於「香港保衛戰」時，於戰爭中任前線士兵的 Kenneth Cambon 之著作。他指出，大部份有關作戰時的研究，都與真實情況有異。由此可見，若以防務部署、軍事失誤方面著手研究，很有可能與有事實偏差。

在《1937 至 1941 年間香港社會對日本侵略的戰爭意識》一文，筆者嘗試以社會史的角度，由香港社會各方面的情況，例如港日兩軍的防務工作、香港社會在「七七事變」後的特徵，以及社會中的極端多元化及矛盾等情況，去分析香港



社會對日本侵略的戰爭意識，以及港府及社會上的錯失，如何導致港府迅速敗陣。

筆者相信，在戰爭中致勝之道，有效的防務部署及軍事力量，必定要配以正確的社會意識及民心一致方能勝利，缺一不可。筆者希望透過本文，讓讀者了解到戰前香港社會的問題所在，並希望讀者可以從港府這次失敗中，於管治上得到一些啓發。

聲明 (Declaration)

I declare that this dissertation represents my own work, except where due acknowledgement is made, and that it had not been previously included in a thesis, dissertation or report submitted to this University or to any other institution for a degree, diploma or other qualifications.

Signed: _____

鳴謝 (Acknowledgements)

I sincerely thank Dr. HUI Chun-Hing (許振興博士), my supervisor, for his guidance and advice throughout the process for this dissertation. In addition, my gratitude is also extended to entire staffs in the School of Chinese, Special Collection Section of HKU Library and Special Collection & Archives of HKBU Library, which have offered me great help in two years of study.

In the meantime,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my warmest thanks to my parents, Mr. TANG Hon-Keung Windsor (鄧漢強先生) and Mrs. TANG FUNG Chui Kuen, Stella (馮翠娟女士), whose ultimate support and encouragement have strengthened me to finish this dissertation.



目錄

摘要

聲明（英語）

鳴謝（英語）

1. 緒論

2. 港、日雙方於 1937-1941 年間就「香港保衛戰」的準備工作

2.1 港府的準備工作

2.2 日軍的準備工作

3. 「七七事變」後的香港社會

3.1 「七七事變」前的香港社會概況

3.2 「七七事變」發生後對香港社會的即時影響

3.3 「七七事變」後香港社會特徵

4. 「七七事變」香港社會的光輝面 – 抗日救國的運動

4.1 香港社會各界的抗日救國運動

4.1.1 香港電影界的抗日救國運動

4.1.2 香港學界的抗日救國運動

4.1.3 旅港商會的抗日救國運動

4.1.4 香港工人的抗日救國運動

4.1.5 香港社會其他的抗日活動

- 4.2 南來人士的抗日活動
 - 4.2.1 「七七事變」前後香港的文學發展情況
 - 4.2.2 南來的作家在香港的情況
 - 4.2.3 南來文化界人士在港辦報的情況
 - 4.2.4 南來的戲劇界人士在香港的情況
- 5. 「七七事變」香港社會的黑暗面 – 頹廢的資本社會
 - 5.1 「富貴難民」南逃到港後的生活
 - 5.2 朝思暮想發國難財的香港人
 - 5.3 令人歎息的社會百態
- 6. 日軍襲港前夕的香港社會
 - 6.1 毫無戰爭意識的港人生活
 - 6.2 戰前一刻
- 7. 從社會的現象分析香港社會對日本侵港的戰爭意識
 - 7.1 港府的政策與香港社會對日本侵略的戰爭意識關係
 - 7.2 人口結構的複雜性與香港社會對日本侵略的戰爭意識關係
 - 7.2.1 香港原住民對日本侵略的戰爭意識
 - 7.2.2 南來文化界人士對日本侵略的戰爭意識
 - 7.2.3 電影業人士對日本侵略的戰爭意識

7.2.4 南來商人之生活對香港社會的日本侵略戰爭意識影響

7.3 香港社會對日本侵略的戰爭意識低落之原因

7.3.1 香港社會各界對日本侵略的戰爭意識情況

7.3.2 港府未能提升香港社會對日本侵略的戰爭意識

7.3.3 報章報導手法失實影響香港社會的日本侵略戰爭意識

7.3.4 社會文化低落使香港社會對日本侵略的戰爭意識不能散播

7.3.5 社會只著眼於抗日救國而忽視自身受日本的威脅

7.3.6. 社會腐化令香港社會難於建立對日本侵略的戰爭意識

8. 總結

1. 緒論

「香港保衛戰」的慘敗，不少學者都指是因為港府的佈防工作、指揮失敗、英軍輕敵各方面所引致。無疑，這一些原因都是正確。但我們不能忽視的是，一場戰爭的勝利，除了要有先進的武器、嚴密的佈防及出色的指揮外，社會的戰爭意識，以及各界能上下一心，共同抗敵的力量，亦是缺不可失的。

而所謂「日本侵略的戰爭意識」於本文的定義，是香港社會對日本揮軍侵港的意識。而本論文所研究的議題，是以香港 1937 至 1941 年間社會各方面情況，去分析香港社會對日本侵略的戰爭意識長期低下的原因。同時，這一些亦都是「香港保衛戰」港府的慘敗的原因。

在 1937 至 1941 年間，大量不同背景的難民，包括文化界人士、演藝界人士、商人、一般平民等，都因「七七事變」爆炸而由中國湧到香港，這使香港人口在兩年間急升 75%。大量不同背景的難民到港，使香港社會的文化及民風起了不少的變化。雖然，香港社會確實有抗日救國的意識，但社會對日本侵略的戰爭意識，都因為在多種社會問題下，未能於社會發展起來。

筆者會在以下各章節，透過 1937-1941 年間港府的防務準備工作，以及社會各界的情況，去分析香港社會對日本侵略的戰爭意識低落的情況及原因。



2. 港、日雙方於 1937-1941 年間就「香港保衛戰」的準備工作

2.1 港府的準備工作

英國在處理日本侵略中國的問題上，以嚴守中立為方針，目的是避免與日本有正面衝突，從而影響其在華利益。然而，在表面中立的同時，港府有監視在港日本人的活動，以及進行防務工作，以確保英國在香港的管治及利益。

受到 1922 年「華盛頓海軍條約」(Washington Naval Treaty) 中第十九款所規限，英國在香港不能任意增派軍隊，因而影響了防務工作的進行。但當日本於 1934 年 12 月單方面終止履行條約後，港府於 1935 年，便開始部署香港的防務工作。早期的防務工作，是在十分秘密的情況下進行。例如旅港的文學家穆時英 (1912-1940) 曾經指出：「1935 年冬天，香港的報紙在最觸目的地位元詳細地記錄看九龍半島的獅子山的虎患。這消息是由香港警察局正式發給各報館的，而且連續登載了一星期……香港政府派了許多員警去防守，禁止任何人接近這危險區域。可是英國陸軍部派來的工程師卻每天一早便跑了去……過了兩個月，老虎的傳說漸漸消隱了，誰也不知道這故事是真的還是捏造的。然而有一件事即是真確的，山上已經縱橫地鋪滿了不准通行的軍用公路，山巔也圍了電網。據附近的居民說，工人們每天晚上都在往山上搬運十六寸口徑的要塞炮。」¹。而工程何時開始、完成建設，普遍民眾都不知道。

當時，港府以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瑪奇諾防線」(Maginot Line) 為構思，耗

¹穆時英：〈英帝國的前哨：香港〉，載盧瑋鑾編：《香港的憂鬱 - 文人筆下的香港（一九二五 - 一九四一）》，（香港：華風，1983 年），頁 92-93。



資 5,000,000 英鎊，重新部署了一條由醉酒灣（今葵涌工廠區一帶）至牛尾海的「醉酒灣防線」（Gin Drinkers Line），防線中有不少戰壕、地堡、及機槍陣地等設施。而港、九多處亦興建了炮臺、防空洞、碉堡等軍事設施。在 1937 年 3 月，當各項工程將近完成時，港府進行了一次大型軍事演習。但演習的結果，顯示出香港的軍力及防禦工作都不足夠。而在進行防務工作的同時，港府亦開始對一些日本駐港機構，進行秘密監視²。

當「七七事變」發生後，英國十分關注戰爭對香港的政治及經濟影響³。當時的駐港英軍司令巴多樂謀少將（Major-General A.W. Barthlomew，生卒不詳），更即時與英國參謀部，分析日軍及駐港英軍的軍事情況。會中，巴多樂謀要求英國參謀部在新加坡增派一個師團到香港協助防衛，但不得要領。當羅富國（Sir Geoffry A.S. Northcote，1881-1948，1937-1941 年在任）於 1937 年 10 月就任港督後，更建議把香港列為不設防「中立城市」，但被英國首相邱吉爾（Sir Winston L.S. Churchill，1874-1965，1940-1945、1951-1955 年在任）所拒。到了 1938 年，日軍已佔領香港鄰近的東沙群島、珠江口各島嶼，並經常派遣戰機進入香港領空，並從陸路橫越中港邊界、空襲九廣鐵路⁴及截停英國的商船。可是，為了確保在香港的統治以及在遠東地區的影響力。英國一面嚴守中立，對日軍的行動處處忍讓外，更嚴禁止香港的報章、傳媒以宣傳抗日運動，目的是避免與日本有正

² CO129/562/23, Koshu Koshi Kabushiki Kaisha : Suspected Activity as Japanese Agents, April 2, 1937 to August 25, 1937, ff 11, pp 1-28.

³ CO129/563/13, Sino-Japanese War : Comments at Cabinet Meeting, August 17, 1937, pp1-4. & CO129/563/11, Sino-Japanese War : Political Situation, f 5, pp 1-46.

⁴ CO129/567/4, Traffic of arms to China and Japanese air-raids on Kowloon-Canton Railway, ff3-8, pp1-265.



面衝突，影響香港的安全。

同時，港府亦有兩手準備，並以防衛德國襲擊為藉口，開始了新一輪防衛工作。港府首先不斷修訂《防衛條例》，以便進行防衛工作。其後于 1938 年初，成立防空處以訓練空防人員。2 月及 3 月，港府先後進行燈火管制及三軍軍事演習。不久，駐港英軍司令格拉錫（Major-General A.E. Grasett，生卒不詳），重新部署「醉酒灣防線」及邊境附近的防線，希望藉此加強九龍及港島的防禦⁵。到了 7 月，《緊急條例》及《戰鬥人員義務法例》生效，確認了香港在中日戰爭中的中立地位。並同時實施懲兵制、新聞及電影審查制度，禁止抗日宣傳。其後到了 10 月，日軍首次接觸港府，並保證其軍事行動不會影響香港，因此，港府批准了日軍軍艦於 11 月訪港。

到了 1939 年 2 月，日軍與中國軍隊於羅湖交戰期間，於香港境內投下兩枚炸彈，導致 12 人喪生及 1 輛火車損毀。事後，英國政府向日本提出抗議，日本答應賠償 20,000 港元了事。三個月後，「香港防衛隊」⁶增加了兩營軍力。到了 7 月，再度進行燈火管制及三軍軍事演習。翌月，基於日軍在中港海陸邊境的勢力漸大，因此港府下令封鎖沙頭角公路及鯉魚門海域，並派英軍駐守。到了 9 月，英國向德國宣戰，香港隨即以英國與德國交戰為藉口，成立了「貿易統制處」及「糧食管制處」，以管制外匯、貿易、工業原料等出入口之餘，亦控制食品數量及價格。同時，亦成立新聞檢查制度，企圖防止情報外泄之餘，亦遏制社會的抗

⁵ 可是，當時英國政府反而建議要把香港的防衛減少一半，而空防力量則依賴駐新加坡英軍支持。

⁶ 即「皇家香港軍團（義勇軍）」的前身。



日宣傳運動，以免刺激日軍。到了 11 月，大量日軍集結邊境，港府決定擴大現有官職的職權⁷，以應付戰爭的來臨。

到了 1940 年 3 月，港府成立「戰稅局」，專責戰時稅收事宜。5 月，應英國方面的指令，港府宣佈進入緊急狀態。並成立了一團由 55 歲以上英國人組成的「休斯兵團」(Hughesiliers) 防衛部隊。一個月後，港府宣佈擴大兵役範圍，並開始儲糧計畫及發行公債六百萬元，以作備戰之用。並同時強制英籍婦孺離去香港，撤退到澳洲及菲律賓。在撤僑的公告中，港府首次不點名評擊日本「有等軍閥不肯服從其本國政府節制，妄動生事。」⁸之餘，亦指出「預料將來數月內，大英帝國即遭遇嚴重關頭……吾人決定離開香港之人數越多越妙……」⁹這明顯顯示出港府感到日本的威脅。同時，港府情報當局拘捕了一些由日軍派來的間諜。而基於軍事需要，英國政府打破由輔政司出任署理港督的慣例，於 8 月安排諾頓中將 (Lit.-General Edward F. Norton, 1884-1954) 於羅富國養病期間，署理港督職務到 1941 年 3 月。

1941 年，香港殖民地成立 100 周年，但在這緊張局勢下，港府沒有大事慶祝。當時，日軍經常於香港的橫瀾島及蒲台島上空，射擊香港船隻，做成多人傷亡，但港府依然沒有對外公佈這些事件，只是透過英國政府向日本政府交涉了

⁷例如華民政務司兼管情報事務、財政司兼管貯備事務等。

⁸謝永光，《香港抗日風雲錄》（香港，天地，1995 年），頁 185。

⁹同上。



事。爲了遏止各國與香港的間諜活動，港府於 6 月宣佈積極組織特務員警察¹⁰。

到了 8 月，日軍於邊境與英軍對峙，並意外射殺一名香港居民。到了 9 月，久病多時的羅富國離任，由楊慕琦（Sir Mark A. Young，1886-1974，1941、1946-1947 在任）接任港督，而駐港英軍司令一職，亦改由馬爾比（Major-General Christopher M. Maltby, 1891-1980）接任。到了 11 月，兩營加拿大士兵到香港增防，目的是阻嚇日軍的軍事行動，可是，日軍再在邊境射傷了一名香港居民¹¹。其後，英軍聯同早前到港的加拿大士兵，舉行防衛大演習¹²，港督亦向軍隊下達戒備令。12 月，港府收到消息，指有約 60,000 名日軍於邊界集結，準備侵襲香港。於是港府隨即發出疏散令，命令各英籍婦孺及各國船隻立即離開香港，而華人則自行疏散¹³。不久，日軍突襲香港，戰爭爆發。在戰爭爆發約十三小時後，港督楊慕琦於晚上，透過播音台向全港市民發表講話，表示港、日雙方已經開戰，希望華人與英人並肩作戰，共同抗敵。

2.2 日軍的準備工作

早於 1920 年代，日本便派人到港，從事間諜活動。當裕仁皇太子¹⁴（Crown Prince Hirohito，1901-1989）於 1921 年 3 月訪問香港後，港日之間的商貿開始發展起來。然而，日本對中國向來都有侵略之心，而香港是自由港之餘，在地理上又接近中國，而日本人洞識到港府對他們沒有太大介心。因此，一些日本間諜，

¹⁰ 《星島日報》，1941 年 6 月 23 日。

¹¹ 《光明報》，1941 年 11 月 24 日。

¹² 《光明報》，1941 年 11 月 29 日。

¹³ 《星島日報》，1941 年 12 月 3 日。

¹⁴ 裕仁皇太子即是其後的「裕仁天皇」（Emperor Hirohito）。



便開始在香港活躍起來。

到了 1930 年代中，日本的軍事間諜開始於香港，從事刺探軍情活動，為日後入侵香港作準備。他們以不同的身份，例如廚師、理髮師、侍應等，在社會以及他國的艦艇上工作。穆時英（1912-1940）在其文章曾指出：「正像世界上其餘重要的都市，軍港和要塞住著許多不必要的日本人一樣，香港也住著幾個不必要的日本人，開著一些門庭冷落的理髮店，西服鋪、料理店、靴店……日本舞女也像是專門為皇家海軍士兵而來的……香港的軍用公路、炮臺、高射炮堡壘、船塢、軍營的四圍，沒有一天沒有日本人在打獵或是釣魚，甚至攝影……日本的眼睛到處窺視看。」事實上，在香港淪陷後，不少原先在香港從事不同職業的日本人，都會以軍官身份出現。例如粵劇名伶陳鐵善（生卒不詳）在淪陷後，發現港日政府的文藝班班長和久田幸助（生卒不詳），就是淪陷前相識的文具店店員「李先生」。而戰時日本駐上海副總領事岩井英一（生卒不詳），亦以牙醫身份在港出現¹⁵。而某位元曾經服務兩位元港督、輔政司、警務處長、滙豐銀行大班的日籍理髮師，在香港淪陷後以海軍佐級軍官身份出現¹⁶。而根據日本方面的記錄，日軍早於 1938 年開始，利用駐廣州的第 21 軍為基地，派遣人員到香港，並利用在香港的日本僑民，搜集香港各方面的資料¹⁷。1939 年，日軍計畫利用三合會「洪邦」在香港的分支，即其後的「第五縱隊」，從香港內部進行顛覆活動。1940 年，日

¹⁵ 謝永光，《香港抗日風雲錄》（香港，天地，1995 年），頁 86。

¹⁶ Gillingham, Paul, *At the Peak : Hong Kong between the wars* (Hong Kong : MacMillan, 1983), pp169.

¹⁷ （日本）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室著；天津市政協編譯委員會譯：《香港作戰》，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頁 35。



軍陸軍參謀部派遣人員僑裝中國人到香港，與香港「洪邦」聯絡¹⁸。面對日本眾多的間諜，港府明顯疏於防範，到 1940 年才進行反間諜活動，驅逐日本間諜出境。雖然隨後日軍被迫終止行動¹⁹，但從這些經常「打獵、釣魚、攝影」的日本人口中，日軍當局了已掌握了不少港府軍事佈防、地理環境等資料，並製成〈香港附近防禦設施圖〉。

而日本侵略香港的計畫，於 1939 年中開始。在同年 12 月批准的「香港作戰要領」中，勾劃了進攻香港的方式。到了 1940 年 6 月，德軍擊敗法國軍隊後，全力攻擊英國。日軍深信，英國處於劣勢，根本無力保護到其殖民地，這是日本擴大其「大東亞共榮圈」的好機會²⁰。因此，日軍於一個月後，落實進攻香港的工作。在 1941 年 7 月，由於英國、荷蘭都跟隨美國，宣佈凍結日本的資產，使日本的經濟面臨空前的困難外，中國行政院院長蔣介石（1887-1975）亦於在 8 月宣佈與美國、中國、英國及蘇聯成立了聯合戰線。這逼使日軍以同年 11 月為期限，迅速解決南方作戰問題²¹。11 月，日皇裕仁（Emperor Hirohito，昭和天皇（Showa Tenno），1901-1989，1926-1989 在位）批准對英、美宣戰的計畫，預算用半年時間攻佔香港。不久，軍方於 11 月 6 日命令準備攻佔香港²²，而日軍在澳門及深圳的情報所，亦不斷在香港上空作偵策活動，對英軍的軍力及部署有充份的掌握。到了 12 月，負責進攻香港的第 23 軍收到命令，在確定攻擊馬來亞時，

¹⁸ 同上，頁 12-13。

¹⁹ 同上，頁 14。

²⁰ 同上，頁 11-12。

²¹ 同上，頁 23。

²² 同上，頁 29。



同時進攻香港。日軍於 12 月 8 日早上，突襲啓德機場，日本侵港亦成爲了鐵一般的事實。

3. 「七七事變」後的香港社會

3.1 「七七事變」前的香港社會概況

在「七七事變」前，香港在東亞地區而言，可以說是一個設備先進的城市。船隻進出香港的數目，在世界上僅次於紐約（New York）、倫敦（London）及神戶（Kobe）²³。據不少曾到訪香港的中國及日本人記載，香港的夜景最令他們印象深刻。有日本人形容香港夜景是「神戶夜景的放大」²⁴，更堪稱是「東洋之冠」²⁵，亦是「世界四大夜景之一」²⁶。而太平山及港島南區的西式景致，如牛奶公司的牧場，淺水灣的沙灘，都充滿外國情調²⁷。而最多人讚歎的，則是圍繞著香港島，四通八達的行車柏油馬路。這一些馬柏油路，連當時的日本亦甚為少見的。而社會的財富，則掌握於英國人及極少數華人之手中。

繁華的背後，絕大部分的華人都十分貧窮，而且文化低落。他們通常一家數口，居住於約 60-70 平方尺的木板隔間房、燒柴做飯、洗澡，而居住環境衛生極差，逾寸長的蟑螂及「坑渠老鼠」更不時在廚房中出沒，睡床的木板亦滿布木虱²⁸。而街童從事不同的工作，已換取收入。一些日本人曾在維多利亞港中，看見街童工作的情況：「瘦小的弟弟一邊在船頭蹣跚地走動，一邊模仿哥哥伸出手來拍掌，用沙啞的聲音（向旅客）高喊：「十錢，拋下來啐。」」²⁹在碼頭上，也充

²³山本實彥：〈凝視支那的興亡〉，載陳湛頤編著：《日本人訪港見聞錄（1898-1941）》，（香港：三聯，2005 年），下卷，頁 327。

²⁴高濱虛子：〈渡法日記 - 香港公路〉，載同上，頁 286。

²⁵東恩納寬惇：〈《泰國·緬甸·印度》之〈南溟記〉〉，載同上，頁 275。

²⁶橫光利一：〈歐洲記行〉，載同上，頁 292。

²⁷三捲進夫：〈橫越赤道〉，載同上，頁 327。

²⁸陳潤培：《香港淪陷親歷記》，（香港：紅出版，2008 年），頁 327，19-20。

²⁹野上彌生子：〈歐美之旅〉，載陳湛頤編著：《日本人訪港見聞錄（1898-1941）》，（香港：三聯，2005 年），下卷，頁 327。



斥著各種年齡的人力車夫、苦力、報販、赤腳的婦女等。而由上海到香港的編劇楊彥岐則（易文，1920-1978）形容，香港「地太少，人太笨……文化情度的低落，可憐又可笑」³⁰。這就是香港社會在「七七事變」前的景況。

3.2 「七七事變」發生後對香港社會的即時影響

「七七事變」後，中國沿海大部份地區先後失陷。基於地理環境，及處於大英帝國的統治下，香港便成為中國難民首選的避難所。而大量中國難民湧入，使香港社會有著顯著的改變。最明顯的，就是人口問題。

在 1930 年代初中期，香港的整體人口，維持於 75 至 100 萬之間。但「七七事變」後，首批為數約 5,000 人的難民於 8 月到港，其後到港的難民人數不絕，使香港人口於 1938 年升至約 123 萬，到了 1939 年更升至約 175 萬，較 1937 年中上升了 75%。人口於短時間內急漲，最直接的影響便是住屋供應緊張。「七七事變」前，由於經濟不景氣，一些勞工更返回中國，使香港的空置住宅單位大增。但在「七七事變」後，大量難民湧入，住宅單位因此由供過於求，變成求過於供。不少業主在這情況下，把住宅租金一加再加，而負擔不起租金的市民，業主便隨意逐走他們，不少人因此被逼流落街頭。而港府於 1938 年通過《防止逼遷條例》，禁止業主在租約期內任意加租。

租金急升所衍生的問題，就是通貨膨脹加劇。除了租金急升外，米價亦同時

³⁰ 楊彥岐：〈香港半年〉，載盧瑋鑾編：《香港的憂鬱 – 文人筆下的香港（一九二五 – 一九四一）》，（香港：華風，1983 年），頁 207。



急升，單是第四級米（下等米），由 1937 年 6 月時每百斤（100 catties）港幣 7.31 元，升至 8 月時的 9.16 元，升幅達 25%。雖然其後於 1938 及 1939 年有所回落，但價格仍然比「七七事變」前為高。可是，香港市民的收入並無顯著上升。由此可見，收入與物價升幅有嚴重差距，使香港市民的生活十分困難。

由以上可見，人口急增及通貨膨脹急升，就是「七七事變」後對香港社會的即時影響。

3.3 「七七事變」後香港社會特徵

香港本身的人口，普遍都是貧窮、文化素質低下的。然而，香港本身的人民風比較純樸，即使是華人的殷商富賈，他們的行為舉止都較為踏實，甚少奢華。可以，「七七事變」後由於大量中國難民擁入，使香港社會充滿了尖銳的矛盾及複雜性，民風亦有所改變。由中國到港的難民，不同的階級也有。例如粗人、流氓、商人、銀行家、教育家、文化人、藝人等。當中，有身無分文的，有腰纏萬貫的；有目不識丁的，有學富五車的。而他們本身來香港的目的，亦有不同，有些純粹為了避難、營商、從事文化、演藝，甚至間諜活動。而當時在香港社會中，有人落力從事抗日救國運動；也有人活於紙醉金迷的世界；亦有人朝思暮想地發國難財；更有人從事各間諜收集情報。一如許地山（1894-1941）所言，當時香港社會是「五方雜處，禮俗不齊」³¹。

³¹ 許地山：〈一年奈的香港教育及其展望〉，載同上，頁 134。



由此可知，在「七七事變」後，香港社會變得十分複雜及多極化。而亦因為每個界別的人之思想，以及來到香港的目的也不同。因此，在欠缺共同目標下，縱使香港社會有抗日救國意識，但始終未能使社會有日本侵略香港的戰爭意識。

4. 「七七事變」香港社會的光輝面 – 抗日救國的運動

「七七事變」爆發後，香港社會隨即牽起了新一輪的抗日救國情緒。同時，受日軍侵華的戰火影響而南來的人士，亦於香港繼續參與抗日救國活動。然而，在參與抗日救國的同時，雖然有文化界人士指出，香港本身亦極可能會受日本戰火的洗禮。但基於有機會接觸到這訊息的人太少，兼且在香港社會上，主題都是救國為先，而沒有考慮香港本身面臨的威脅。因此，香港社會對日本的侵略戰爭意識，始終十分薄弱。

4.1 香港社會各界的抗日救國運動

4.1.1 香港電影界的抗日救國運動

香港本土電影業的抗日愛國運動，始於 1934 年上映的《戰地歸來》。《戰地歸來》是以在 1932 年「一二八事件」為背景，主旨是向觀眾表達中國人民應奮勇地對日本的侵略，上映後大受香港民眾歡迎³²。

到了「七七事變」爆發，愛國抗日的電影一躍成為香港電影業的主流³³之餘，香港的電影業工作者洶群而出，推行抗日救國運動。「七七事變」後約三星期，一眾電影界人士成立了「香港電影界賑災會」，目的是把香港電影界全工組織起來，一起進行抗日運動³⁴。賑災會成立後，立即倡議聯合開拍一出抗日電影，目

³²《戰地歸來》為香港電影公司「國聯影片公司」於 1933 年 7 月開拍，1934 年 2 月上畫的電影。該片公映時，在香港十分受歡迎。參餘慕雲：《香港電影史話》，（香港：次文化堂，1997 年）卷二，〈三十年代〉，頁 42-43。

³³同上，頁 138。

³⁴同上，頁 141。

的是向香港民眾表達各人需要犧牲個人利益，救國抗敵的必要性³⁵。這電影就是中國一百部名片³⁶之一 - 《最後關頭》。該片的拍攝資金，主要是透過「女明星義舞大會」³⁷及電影界全人的捐募而來³⁸。而製作方面，由六間香港製片廠³⁹，八位導演⁴⁰及所有香港電影影員參與義務的拍攝工作。

電影於 1938 年公映時，深受香港民眾歡迎，當時各主要戲院每日都全院滿座，戲院裡更充滿著抗日愛國的情懷⁴¹。吳楚帆（1910-1993）憶述當時「觀眾如潮從四面八方湧到戲院，放映時間內四座掌聲雷動，影片振奮人心」⁴²。而在扣除其他開支後，「香港電影界賑災會」把所有票房收入，全數捐給國民政府作抗日之用。而該片的海外版權費，則全數作購買救國公債之用。

《最後關頭》這齣戲的意義，在於電影界全工，能展示出抗日救國情懷之餘，他們亦成功令社會，培養出抗日救國的意識。其後，香港出產的抗日救國電影，高達 25 部⁴³，成為香港電影業的主流電影。日本評論家大宅壯一（1900-1970）於 1937 年 11 月在香港時，曾經多次到電影院觀賞其他抗日救國電影。他指出，

³⁵ 薛後：《香港電影的黃金年代》，（香港：獲益出版，2000 年），頁 31。

³⁶ 餘慕雲：《香港電影史話》，（香港：次文化堂，1997 年）卷二，〈三十年代〉，頁 139。

³⁷ 「女明星義舞大會」由當時電影界的「悲劇影后」黃曼梨（1913-1998）、「華南影后」白燕（1920-1988）、「南國影后」李綺年（1912-1950）等女星參與。參同上。

³⁸ 薛覺先（1904-1956）、錢大叔各捐出一百元；吳楚帆（1910-1993）、黃曼梨、陳雲裳各捐出五十元，而身為「香港電影界賑災會」主席的何甘棠更捐出了一千元。參同上。

³⁹ 包括「全球」、「大觀」、「南洋」、「南粵」、「合眾」、「啓明」六間電影公司，參謝永光：《香港抗日風雲錄》，（香港：天地，1995 年），頁 18。

⁴⁰ 八位導演分別是關文清、李化、湯曉丹、蘇怡、李芝清、陳皮、南海十三郎（1909-1984）、趙樹燊。參薛後：《香港電影的黃金年代》，（香港：獲益出版，2000 年），頁 31。

⁴¹ 餘慕雲：《香港電影史話》，（香港：次文化堂，1997 年）卷二，〈三十年代〉，頁 142。

⁴² 吳楚帆：《吳楚帆自傳》，（香港：偉青，1956 年）上冊，頁 57。

⁴³ 1935 及 1936 年的港產抗日愛國電影只有 3 部及 6 部。參同上頁 80、118。



電影院裡的情況是「當電影到達高潮，發揮了煽情的效果，觀眾漸漸變得興奮時，便真有點令人生畏了。」⁴⁴、「電影最後映出蔣介石的相片時，觀眾都一齊起立開始唱中國國歌。」⁴⁵、「電影中登場的人，最受歡迎的不用說是蔣介石，他稍一露面，觀眾便為之洪動。」⁴⁶而亦有影評人指出：「我夾雜在千餘人之中看《血濺寶山城》，每隔兩分鐘，在我前面後面，左左右右發出熱烈的掌聲。」由此可見，這一些抗日救國電影，確實使香港社會亦培養出抗日救國的意識。

除了拍攝抗日救國電影外，電影界人士亦參與其他募捐活動。當南京國民政府於 1937 年 8 月發行「救國公債」，以籌集資金應付抗日戰事。其後，香港全體電影工作者在「華僑電影公會」領導下，成立了「香港電影界勸募公債支會」，並通過香港全體電影工作者每月以薪金百分之五，購買救國公債。而香港全體電影工作者，亦同時演出一個為期三天的遊藝大會，收益亦都全數用作購買救國公債。而一些電影公司如「天一港廠」、「大觀影片公司」等，亦把首日上映的電影收益，用作購買救國公債。而個別演員如唐滌生（1917-1959），更取消自己的婚禮，並把婚禮的費用、禮金等，全數購入救國公債，並另外再捐贈 280 港元給中國軍隊之用⁴⁷。由此可見，香港電影業全人除了身體力行地透過演出，向香港民眾傳達抗日作戰的意識之餘，亦積極購買救國公債，盡力救國。

⁴⁴大宅壯一：〈香港戰時色〉，載陳湛頤編著：《日本人訪港見聞錄（1898-1941）》，（香港：三聯，2005 年），下卷，頁 348。

⁴⁵同上。

⁴⁶同上，頁 351。

⁴⁷Ma, Yiu Chung, "Hong Kong's Responses to the Sino-Japanese Conflicts from 1931-1941", (MPhil dissertation,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1). Ch 5, pp.84-85.



4.1.2 香港學界的抗日救國運動

香港學界在「七七事變」爆發後，亦參與抗日救國活動。香港大學學生會主席李政耀（生卒不詳）於 1937 年 9 月成立「中華醫藥救濟會」，目的是收集捐款和藥物，以支援中國的前線軍人及受戰禍影響的平民百姓。而該會亦聯絡香港其他中學，商討聯合進行抗日活動事宜。結果，英皇書院、皇仁書院、聖保羅女書院及官立漢文中學決定與「中華醫藥救濟會」一起，成立「香港學生賑濟會」（又稱「學賑會」），並於港府華民政務司批准下註冊。「學賑會」成立目的，是有計劃地於學界，組織各抗日宣傳運動。在 1938 年，「學賑會」不但創辦了《學生呼聲》，以宣揚學生對抗日運動的看法之餘，也舉辦全港學生徵文比賽、有關抗日戰爭展覽會、戲劇、節食籌款活動等。同時，他們亦於香港各處舉辦義賣、遊藝等活動，目的是向社會各界宣傳抗日意識之餘，亦籌募資金以支援中國的抗日活動。當時，他們的活動，得到香港的工商界、工人、農民、甚至員警的協助及支援⁴⁸。當廣州淪陷後，「學賑會」先後組織了四個為數約百多人的「回國服務團」，到廣東援助災民。

可是，在「皖南事變」後，由於「學賑會」受共產黨的支持，而李政耀亦為共產黨員。因此，國民政府下令驅逐「回國服務團」之餘，亦透過各種手法打擊。結果而「學賑會」在這情況下最終結束了。但其成員仍然沒有放棄抗日活動，他們於香港淪陷後，不少轉為參加「東江縱隊」活動，並成功協助不少中國文化界、軍政界人士逃離香港。由此可見，「學賑會」的學界抗日救國活動，雖然沒有令

⁴⁸ 魯言，《香港掌故》第十二集（香港，廣角鏡出版社，1989 年），頁 49-50。



香港社會提高對日本侵略的戰爭意識，但其對推動香港社會的年青人參與抗日救國活動，有很大的貢獻。

4.1.3 旅港商會的抗日救國運動

旅港商人在抗日救國運動中，最大貢獻在於推廣及認購救國公債。所謂旅港商人，泛指早於 20 世紀初期，已經到香港從事商業活動的殷商。

這一些旅港商人，由於有充足的資金，在憂鄉憂民的情況下，他們大多數都自發進行救鄉救國的工作。例如由一批旅港客家人組成的「崇正總會」，於 1938 年 12 月組成救濟難民會，接濟由中國到港難民。同時，又派遣「崇正醫療隊」，到中國進行救傷扶危等工作。此外，大量旅港組織如「旅港福建商會」、「福建旅港同鄉會」、「旅港三水工商總局」、「旅港潮州八邑商會」等，都積極提供人力物力，透過捐款、購買救國公債，甚至派遣人員到中國，進行救鄉救國的抗日活動⁴⁹。

在得到旅港商人的協助下，香港社會的抗日救國運動在一班有經濟實力的殷商支援下，除了可以提升抗日救國的情緒外，更加能有效地直接說明有需要的人。而在勸捐救國公債一事上，香港各殷商之努力，更是在功不可沒。在於 1937 年 9 月，「救國公債勸捐委員會香港分會」成立，由周壽臣（1861-1959）出任會長，統籌勸捐事宜。救國公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了中國人對中國的抗日支援程度。由 1937 年 10 月到 1939 年 3 月，香港各界合共認購了共值約 664 萬法幣（約

⁴⁹ 蔡榮芳：《香港人之香港史》（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1 年），頁 201-202。



值 166 萬港幣) 的救國公債。這一些資金的來源，除了主要是來自各旅港商會組織外，還有勞工群眾透過工會，節衣縮食地捐出的金錢。事實上，當時香港的生活還境困難，通貨膨脹嚴重。勞苦群眾們在這情況下仍然慷慨解囊，實屬難得。

4.1.4 香港工人的抗日救國運動

香港工人方面的抗日救國運動，是由海員工人展開。海員工人于 1937 年 8 月，成立「香港海員工會」，以推動抗日救國行動。其後，不同行業的工人透過工會組織，組織了不少抗日活動。有約 4,000 名成員，以酒樓侍應為主的「香港酒樓茶室總工會」於 1938 年出版的《酒樓月刊》呼籲全工在工作崗位時，要多加留意茶客的對話及活動，是否為漢奸⁵⁰。而「港九茶居工業總會」於 1939 年出版的《文綱》創刊號中，亦呼籲全工共同抗日⁵¹。而香港電燈公司華人工人的「香港電燈公司華人工餘遊樂會」、煤炭工人的「煤炭總工會」、客棧工人的「方言工會」、海上工人的「帆船總工會」都紛紛組織工人募捐行動，所募集的捐款紛紛轉交國民政府及購買救國公債。而全港的小販亦於 1939 年組成「小販工商聯合會」，派人協助由中國逃到香港地區的新界居民。

工人階級在香港社會中，占了十分大的比重。雖然他們沒有意想到，日本對香港同時有很大的威脅。但他們透過工會，組織了不少捐款活動，大大促進香港社會的抗日救國意識。同時，工人們全都是收入微薄的低下階層，但他們依然願意節衣縮食，利用僅餘的金錢去幫助中國從事抗日活動。這一種心意，實在值得

⁵⁰ 同上，頁 199。

⁵¹ 同上。



後人所尊敬及學習。

4.1.5 香港社會其他的抗日活動

由於「七七事變」後，香港的通貨膨脹嚴重，因此生活還境困難。不過，一些沒有能力出錢捐助的勞苦群眾，依然以不同的表達方式，去宣洩自己的抗日情緒。例如透過衣著、塗鴉、張貼抗日標語、杯葛日貨、拒絕搬運日貨、拒絕維修日本船隻等。一次比較嚴重的抗日事件，是發生於 1937 年 11 月，當時瑞興百貨公司涉嫌與日商有來往，因此店鋪被人破壞，而瑞興百貨公司亦被逼於報章，刊登道歉啓事⁵²。而日本人大宅壯一於香港看見在碼頭的苦力「所戴的污穢破爛的帽子上方，竟然畫了一面青天白日旗……！」，在路上亦看見「一個十二三歲的少年，正在酒店的牌上塗鴉……在抹去之前我已清楚看見「打到……」的字樣」。而他的朋友更向他說「大阪商船香港支店的廚櫥窗上，每天早上必定有打到什麼什麼的塗鴉。」⁵³

由此可見，即使沒有經濟能力的一群。他們仍然透過各種的表達方法，去表達自己的抗日情緒。所以，在香港社會中，雖然對日本侵港的意識十分低落。但另一方面，香港社會亦的確瀰漫著不少的抗日救國情緒。

4.2 南來人士的抗日活動

⁵² 《華字日報》，1937 年 11 月 7 日。

⁵³ 大宅壯一：〈香港戰時色〉，載陳湛頤編著：《日本人訪港見聞錄（1898-1941）》，（香港：三聯，2005 年），下卷，頁 333。



就文化界方面而言，到港的文化界人士，主要分爲作家、報界人士、演藝界人士三個範疇。這一些文化界人士，主要都要愛國憂民的一群。大量中國的文化界人士走難到香港，不但使到香港在文化界、電影界都有新的發展之餘，他們更以不同方法，並利用報業、電影等有效宣傳工具，於香港社會宣揚抗日救國意識，進行抗日救國的宣傳運動。部份文化界人士，甚至準確地分析出，日本會侵略香港的論調。由此可見，文化界人士除了有抗日救國意識外，亦有日軍侵港的意識。

4.2.1 「七七事變」前後香港的文學發展情況

相對與上海而言，香港文學於 1930 年代是處於比較落後的水平。然而，但香港的「新文學」在「七七事變」前，已經開始發展。一些香港青年作者，如謝晨光（生卒不詳）、張吻冰（望雲，1911-1959）等人亦相繼崛起，造就了具香港本土特識的新文學。1931 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後，全國抗日情緒高漲亦湧入香港，中、港兩地的文學界，亦參與抗日救國之列。此後，香港不少文學期刊，均刊出以抗日救國爲主的文學作品，較著名的有黃定求（生卒不詳）於 1932 年的短詩〈給心底親愛的青年戰士〉等。由此可見，在「七七事變」前，抗日意識已植根於香港文學界⁵⁴。

「七七事變」後，抗日意識更爲熾熱。活躍於香港文學界的詩人馬萬祺⁵⁵（1919-），於 1937 年冬天在其詩作《同仇抗敵》中寫道：「可恨倭奴太逞兇，同

⁵⁴ 蔡榮芳：《香港人之香港史》（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1 年），頁 186。

⁵⁵ 即現任全國政協副主席、澳門中華總商會會長。



仇敵愾怒發沖。犧牲已至關頭後，萬眾一心掃孽成。」⁵⁶此外，親國民黨的鄭湛銘亦於同時，組織了「光明文化事業公司」，目的是綜合全國的文化界人士，一起舉辦抗日活動。另一邊廂，香港大學中文系系主任許地山雖然不是親國民黨，但他亦積極投入抗日事業。他身先士卒，於 1939 年出任「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日協會香港分會」會長，並出品多部抗日，以及批評國民政府的作品。⁵⁷

4.2.2 南來的作家在香港的情況

「七七事變」後，中國的左派文化人除了受到日本侵略之威脅外，亦因國民政府大力打擊左派而遷到香港。結果，令香港的文學界潤澤生色不少之餘，也使香港成為文學界的抗日中心。在「七七事變」後一年間，不少文人如李林風（侶倫，1911-1988）、劉培燊（劉火子，1911-1990）、許地山、林語堂（1895-1976）、葉淺予（1907-1995）等組織了一些如「香港文化界座談會」、「高等教育維持會」、「全國漫畫家作家聯會香港分會」等抗日文化組織。而他們亦多次舉辦抗日畫展，向香港社會宣傳抗日救國運動。

到了 1939 年，由中國到香港的文人分為左、右兩派，他們分別成立了「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日協會香港分會」及「中國文化協進會」，雖然兩者都以抗日救國為目的，但雙方亦因政治立場不同而互相明爭暗鬥。在 1941 年 1 月「皖南事變」（新四軍事件）⁵⁸爆發後，國民政府加強了對中國的思想及媒體控制，並以

⁵⁶ 謝常青，《香港新文學簡史》（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1990 年）頁 41。

⁵⁷ 同上，頁 49-51。

⁵⁸ 國共兩黨軍隊於 1941 年 1 月爆發衝突，最後國民黨成功鎮壓共產黨。



強打擊左派文人。因此，一批左派文人如茅盾（沈德鴻，1896-1981）、夏衍（沈乃熙，1900-1995）、胡風（張光人，1902-1985）、薩空了（1907-1988）、鄒韜奮（1895-1944）等人逃到香港。這一些文人到港後，不但使香港的文壇更加多姿多采外，更進一步地宣揚抗日救國意識，例如鄒韜奮到港後創辦《大眾生活》就是好例子。這情況一直維持到香港淪陷，隨著日軍佔領香港後大舉搜捕抗日的文化界人士，大量文化界人士在東江縱隊協助下，逃離香港。

值得注意的是，文人是在香港社會中，唯一指出日本一定會侵略香港的一群。例如方秋葦（生卒不詳）曾在 1937 年〈從軍事上觀察香港〉⁵⁹、穆時英於 1938 年的〈英帝國的前哨：香港〉⁶⁰、盧豫冬（旅岡，生卒不詳）於 1939 年的〈香港的戰略地位〉⁶¹、屠仰慈（生卒不詳）於 1941 年〈歐戰變動中的香港〉⁶² 都分析出香港的戰略地位、日本侵港的誘因及可能性。由此可見，文人具有抗日救國意識之餘，亦透視到香港本身，日軍對香港的威脅越來越大，可見他們有意識到，日本侵略香港的可能性。

4.2.3 南來文化界人士在港辦報的情況

由於香港是英國的殖民地，而且接近中國。再加上，英國爲了維持在香港的統治，延續他們的既有利益，因此港府對中日戰爭採取中立的態度。在這情況下，

⁵⁹ 方秋葦，〈從軍事上觀察香港〉，《東方雜誌》，第三十四卷，第十三號（1937 年），頁 169-170

⁶⁰ 穆時英：〈英帝國的前哨：香港〉，載盧瑋鑾編：《香港的憂鬱－文人筆下的香港（一九二五－一九四一）》，（香港：華風，1983 年），頁 87-96。

⁶¹ 盧豫冬，〈香港的戰略地位〉，《中華畫報》，第 78 期，1939 年 6 月號（1939 年）。

⁶² 屠仰慈，〈歐戰變動中的香港〉，載盧瑋鑾編：《香港的憂鬱－文人筆下的香港（一九二五－一九四一）》，（香港：華風，1983 年），同上，頁 221-229。



不同的政治派系，例如國民黨、共產黨（左派）、汪精衛政權等，都透過文人的協助在港辦報，為自己的立場發聲。這使香港原本只有《華字日報》、《工商日報》、《華僑日報》四分大報的局面，一變地而成為有三十多家報紙百家爭鳴，沉寂一時的黨派報紙亦重新熱鬧起來。在 1938 年 3 月，有國民黨背景的羅吟圃（生卒不詳）由上海來港創辦《星報》。而左派的成舍我（1898-1991）、薩空了則于同年 4 月創辦了《立報》。到了 8 月，南洋商人胡文虎（1882-1954）創辦了《星島日報》，並聘請一些左派人士如金仲華（1907-1968）、邵宗漢（1907-1989）等主持編輯工作。而另一方面，國民黨於 1939 年 6 月，在港創辦《國民日報》⁶³，而汪精衛（1883-1944）在港的喉舌，主要是由胡蘭成（1906-1981）主持的《南華日報》。而共產黨於 1941 年 4 月，創辦了《華商報》。另一份親共報章《光明報》則於同年 9 月創刊，前者由胡仲持（1900-1968）主持，後者都由薩空了主持。這一些報紙，經常報導中國的戰爭情況之餘，最主要的是各自為自己的政治立場辯護。因此，除了《南華日報》因被視為漢奸報而無人理會，被邊緣化外，各報時常會有隔空筆戰的情況，而《國民日報》更是眾多左派人士的攻擊目標。而在日軍侵港前半年間，一場大型筆戰由《星島日報》的金仲華、邵宗漢與《國民日報》的王新命引起，雖然其後《星島日報》的經理胡好在政治壓力下，撤換了金仲華，改由國民黨籍的程滄波（1903-1984）出任。但是，報章間之筆戰依然沒完沒了，一直到日軍侵港後才結束。黨派之間的爭執，卻無助於提升香港社會對日本侵港的戰爭意識。

⁶³ 即《香港時報》前身，於 1993 年停刊。



幸而，在國共雙方的喉舌正在筆戰之同時，原上海《大眾生活》的鄒韜奮（1895-1944）於1941年到港。他在香港出版家曹克安（1909-）的協助下，《大眾生活》於香港復刊。《大眾生活》可以說是當左、右派報紙互相傾軋的時頭，一份能肩負起向香港社會，傳遞有關中日戰爭的消息。《大眾生活》由曹克安出任督印，而他是立法局議員曹善允（1868-1953）之子。曹善允極受港府器重，而曹克安與新聞檢查處的負責官員則十分相熟。在這關係下，由曹克安出任督印《大眾生活》在新聞檢查的關卡上，幾乎可以暢所欲言地報導中日戰爭及抗日運動的消息。而由宋美齡（1897-2003）所辦的《今日中國》畫報，亦交由《大眾生活》代為發行⁶⁴。由此可見，《大眾生活》能使香港社會對中國的戰況有更深刻的瞭解之餘，亦對社會傳遞抗日救國的消息，有正面的說明。

4.2.4 南來的戲劇界人士在香港的情況

粵劇在香港很受歡迎，因為亦是宣傳抗日活動的途徑之一。早於「九一八事變」時，不少名伶如馬師曾（1900-1964）以及一些粵劇團參與義演，把所有收入捐給中國用作抗日之用。「七七事變」後，馬師曾捐款 5,000 港元，以支援中國的抗日戰爭。由此可見，香港的粵劇界，對抗日運動亦十分支持。同時，不少戲劇及話劇界人士，於廣州淪陷後到達香港，繼續從事抗日運動，於香港社會宣揚抗日救國意識之餘，亦積極培養宣傳抗日的人才。

南來香港的演藝人，以粵劇界演藝人為主。廣州淪陷後，不少廣東戲班由廣

⁶⁴ 曹克安：《家居香港九十年》（香港：星島，1986年），頁19-20。



州轉移至香港，最著名的是薛覺先（薛作梅，1904-1956）的「覺先聲劇團」。「七七事變」後，薛覺先演出了一些宣揚抗日救國的劇碼，如《嶽飛》、《英雄淚史》、《王昭君》等，他在電臺唱出由南海十三郎（1909-1984）編寫的歌曲《救國公債》時，更唱至「聲淚俱下，感人至深」⁶⁵。薛覺先在抗日活動中，充分表達了對中國的情懷之餘，亦表達出對日本侵略者的憤慨。由此可見，粵劇界亦能助長香港社會抗日救國的情緒。同時，京劇大師梅蘭芳（1894-1961）亦於南來香港後，與薛覺先一起身體力行，出錢又出力，參與抗日籌款運動，這對推動香港的抗日救國事業，有十分正面的作用。

當時，雖然港府禁止抗日救國的宣傳，但影劇界全人仍巧妙地仍想盡辦法，去宣傳抗日意識。最經典的一例，是於 1941 年由粵曲界編灌的抗戰唱片《春秋義唱》中，以諧音「王青韋」及「阿虜國」，分別影射汪精衛及日本。例如「王青韋呀，狗奸賊……怎麼今日會生出你這等無恥的奸賊來了？」、「阿虜國，侵犯我，鬼神共憤……」⁶⁶這一種影射汪精衛及日本的方法，連港府的檢查官也無合理的原因去禁止。由此可見，只要能宣傳抗日救國意識，影劇界全人會用盡全副心血，做到最好。

話劇界方面，中國著名話劇家歐陽予倩（1889-1963），於 1938 年先後兩次到香港。在港一年期間，不但提高了香港話劇的水準，而且亦參與抗日救國活動，透過編導一些如《曙光》，《屏風後》等話劇，於香港社會宣揚抗日救國的訊息。

⁶⁵ 餘慕雲：《香港電影史話》，（香港：次文化堂，1997 年）卷二，〈三十年代〉，頁 163。

⁶⁶ 謝永光：《香港抗日風雲錄》（香港：天地，1995 年），頁 24。



歐陽予倩亦積極從事各種抗日救國活動，在港期間，不但為《救亡日報》募捐，而且更在「香港中華業餘學校」授課，以培養抗日救國的宣傳人才。

同時，在上海十分著名的話劇家金山（1911-1982）、王瑩（1913-1974）組成「中國救亡劇團」於 1939 年抵港，他們於利舞臺主演以中國於 1938 年春天大勝日軍的「台兒莊會戰」為題，改編而成的《台兒莊之春》。《台兒莊之春》合共演出六場，場場爆滿。這話劇亦對香港社會的抗日活動，起了振奮人心的作用。

綜合來看，戲劇及話劇，讓香港民眾提高了社會的抗日救國的意識。可是，對於香港自身會否被日本直接侵略的問題，香港社會普遍民眾，都顯然未曾認真思考過這一問題。

5. 「七七事變」香港社會的黑暗面 – 頹廢的資本社會

1930 年代的香港，是一個資本主義城市，商人創業的天堂。港人打扮亦喜歡作洋化打扮。而形形色式的娛樂如飲食、跑馬、足球、游泳、電影、戲劇、嫖妓等⁶⁷亦應有盡有。但當時香港的商人比較克勤克儉，奢華揮霍的只是極少數⁶⁸。但「七七事變」後，大量難民到香港難民，有不少是原於上海營商的商家、富豪。這一些「富貴難民」來到香港後，並沒有像南來的文人、戲劇界人士等為香港帶來新的抗日動力。反之，他們為香港帶來的，是奢華、揮霍、紙醉金迷的生活方式。如是者，他們的行為不但使香港社會貧富的壁壘越來越分明外，亦令香港社會變得極端而複雜化，不但對提高香港社會對日本侵略的戰爭意識毫無裨益之餘，亦為社會中的抗日戰爭意識帶來嚴重影響。作家黃若耶（生卒不詳）說：「貧富兩個階級，因為環境的絕對，所表現上的思想行動也各異。大抵貧窮階級的人，飽經憂患，多血性中人。富有階級，物質享受太多，迷了本性，難怪他對於人類同情心冷淡，和國家民族意識薄弱。」⁶⁹，一針見血地指出當時香港社會的問題。

5.1 「富貴難民」南逃到港後的生活

從中國到港的難民中，並非所有都是真心誠意地支持抗日活動，來自中國的「富貴難民」，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富貴難民」把所有的身家性命財產逃到香港，並於香港定居及營商。可是，他們不但沒有思國憂民，而且繼續揮金如土，

⁶⁷ 友生：〈香港小記〉，載盧瑋鑾編：《香港的憂鬱 – 文人筆下的香港（一九二五 – 一九四一）》，（香港：華風，1983 年），頁 53。

⁶⁸ 謝永光：〈香港抗日風雲錄〉（香港：天地，1995 年），頁 67。

⁶⁹ 黃若耶：〈時代動盪中的香港〉，載盧瑋鑾編：《香港的憂鬱 – 文人筆下的香港（一九二五 – 一九四一）》，（香港：華風，1983 年），頁 106。



過著奢華生活。結果，他們亦令香港社會，變得崇尚拜金主義。例如，香港的商店不少夥計，因為上海人有很高的消費能力，所以會對他們特別殷勤。薩空了曾聽朋友說：「以前在香港乘的士，表上跳出來的是九角五分，用一元給汽車夫，他一定很老實的找給你五個仙……十幾萬上海人來過之後，一切不同了，你坐七角錢的車子，給一元錢叫汽車夫找時，他即道了一聲謝，竟而想沒收你所餘的三角錢，作酒錢了。」⁷⁰從中國到香港的文化人，為香港帶來了不少抗日救國的情緒。但「富貴難民」們為香港帶來的，以腐化的生活。外交家顏惠慶（1877-1950）曾經以這些難民「帶來不少鄙陋作風……所謂「夜總會」、「舞廳」、「伴舞娘」，「女導遊」，以及窮奢極侈的應酬，比晝作夜的生活……」⁷¹，而當時香港最出名的「百樂門舞廳」，就是由「富貴難民」從上海帶來的。

而勸捐救國公債一事，更加是香港社會的一面「照妖鏡」。俗語有云：「有錢出錢，無錢出力」，既然本地的商會及工人都有「出錢出力」那麼，這一些本身是因為日本侵華而南逃香港的商人，理應都會對戰火禍害更有體會，並「出錢出力」吧。但事實並非如此。據文人王禮錫（1900-1939）所說：「有錢的人……他們簡直以為祖國為贅瘤，只會向他討錢……有一回，香港救國公債勸捐分會曾邀請各富豪出席會議，擬即席勸銷公債，誰知到開會當天，出席者寥寥可數，是會卒到流產，原來所謂的富豪們，都躲到馬場去消遣了。」⁷²由此可見，這一些曾

⁷⁰ 了了：〈建立新文化中心〉，載盧瑋鑾編：《香港的憂鬱－文人筆下的香港（一九二五－一九四一）》，（香港：華風，1983年），頁101。

⁷¹ 謝永光：〈香港抗日風雲錄〉（香港：天地，1995年），頁67。

⁷² 黃若耶：〈時代動盪中的香港〉，載盧瑋鑾編：《香港的憂鬱－文人筆下的香港（一九二五－一九四一）》，（香港：華風，1983年），頁106。



經身受戰害的「富貴難民」，對受同樣影響的中國同胞，不但沒有身同感受之餘，而且還麻木不仁。相對於本地的商會及工人，這一些來自中國的「富貴難民」是絕無抗日的意識可言的。

而香港社會亦因為這一些「富貴難民」，而變得糜爛起來。例如酒樓食肆為了同時吸引一些本地及上海的大豪客光顧，因此他們會盡費心思，想出一些愛國與色欲並重的菜名，例如「鳳入羅幃」、「抗戰到底」、「戀愛成功」、「大吉利市」、「春宵一刻」⁷³等。即使到了 1941 年 12 月，而日軍大軍壓境，準備入侵香港之時，「北平厚得福酒家」連續多天，在報紙刊登「應時羊肉涮鍋」廣告⁷⁴。「勝斯大酒店」價值 30 元（1939 年時，一般工人的日薪是大約 0.6 元至 0.8 元。⁷⁵）的酒席依然供應「蟹黃寶鼎翅」、「原條白汁斑」、「紅燒美鮑片」、「乾煎明蝦碌」⁷⁶等菜色……至於電影的廣告，更加不堪入目，例如在 1938 年的《桃園春夢》「桃園村裡，陰盛陽衰，大瀑布下，春色一片。」⁷⁷同年的《奇女子》則以「肉感的奇女子，奇得令你心花怒放，奇得令你春情蕩漾……肉騰騰，白雪雪，酥胸玉腿，一片春色。」⁷⁸作招徠。1941 年 11 月的電影《風流寡婦》則道「性的饑渴，愛的矜持。母親寡後，女兒奪戀。」⁷⁹不少百貨公司，亦各出奇謀地招攬顧客，例

⁷³ 陸丹林：〈上海人眼中的香港〉，載盧瑋鑾編：《香港的憂鬱 – 文人筆下的香港（一九二五 – 一九四一）》，（香港：華風，1983 年），頁 144。

⁷⁴ 《大公報》，1941 年 12 月 2 日至 12 月 5 日。

⁷⁵ *Annual Reports on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progress of the people of the Colony of Hong Kong during the year 1939*, pp 24.

⁷⁶ 《大公報》，1941 年 12 月 5 日。

⁷⁷ 《星島日報》，1938 年 11 月 14 日。

⁷⁸ 《星島日報》，1938 年 12 月 6 日。

⁷⁹ 《大公報》，1941 年 11 月 20 日。



如「香港中國國貨公司」爲了紀念三周年志慶，凡「購貨貳元，可打考爾夫」⁸⁰

王禮錫於 1939 年到訪香港，形容香港社會「僑居富賈，息影政客，嬉游無度如故。此時寇正燒新圳，新界難民如螞蟻。」⁸¹由以上種種，可以瞭解到當時由中國逃到香港的商人，如何沉醉於聲色犬馬的生活，這亦是香港社會的另一面。

5.2 朝思暮想發國難財的香港人

麻木不仁的不只是「富貴難民」，香港的業主們，同樣是見利忘義的。一如前文所述，「七七事變」後香港的人口急升，在供不應求的情況下，不少業主一次又一次地加租，甚至在租約未完成下，肆意加租。如負擔不起的，業主便會下逐客令，強行逼走租客。結果，被逼遷的人越來越多，露宿者的人數直線上升。據警務處估計，在 1938 年，有約 27,000 名露宿者⁸²。而控制房租方面，港府於雖然於 1938 年頒佈《防止逼遷條例》後，情況依然未有顯著改善。因此，港府於 1939 年與東華三院及旅港惠陽商會，於邊境附近興建難民營。並于大埔及青山加強警力，以免難民湧入市區⁸³。黃若耶對此曾經形容：「香港的「地皮」，素來是貴的……現在突然增加的二三十萬人，除少數安插到半島酒店山頂住區之外，其餘的還不是像「打樁」插進這些白鴿籠子去……狠心的業主還拚命加租，從前三四十元的房子，現在非五六十元租不到。這不理人家死活的行爲，還不如

⁸⁰ 「考爾夫」即高爾夫球，見《大公報》，1941 年 12 月 2 日。

⁸¹ 王禮錫：〈香港竹枝詞〉，載盧瑋鑾編：《香港的憂鬱－文人筆下的香港（一九二五－一九四一）》，（香港：華風，1983 年），頁 161。

⁸² *Annual Reports on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progress of the people of the Colony of Hong Kong during the year 1939*, pp 184.

⁸³ 同上，頁 185.



趁火打劫的。」⁸⁴而露宿者的情況令人婉息，文俞曾經看過一個露宿家庭，他說「這家庭有丈夫，有妻子，有兒女，他們就把我的寓所那度樓梯底的空間建立起一個家來。他們有許多的傢俱……那些東西佔有了地面的四周，餘下來的確名符其實的，僅可容膝的地方。」⁸⁵由以上所見，可以瞭解到當時的露宿者的情況是可等惡劣。而業主瘋狂地加租，確實令香港社會產生了連串的住屋及公共衛生問題。

糧食亦是一個嚴重問題。「七七事變」後，米價於兩個月急升 25%，雖然隨後米價回落了一些，但依然較之前昂貴不少。而據港府海關統計處於 1941 年 11 顯示，香港物價較 1940 年同期上升了 25%⁸⁶。米價居高不下的原因，主要是不少米商以及個別人士，在低價時購入大米囤積居奇，企圖把米在高價售出圖利。有見及此，港府成立「糧食統制處」，以控制食品價格。可是，由於大米的需求甚大，所以衍生了米的黑市市場。而由於米商於黑市市場有利可圖，因此他們十分樂意讓黑市市場繼續存在。港府曾於 1941 年 5 月，與米商商討解決黑市米問題，但米商不願意解決⁸⁷。除了米商外，不少市民也懂得利用局勢混亂，購入大量白米待價而沽。溫功義（生卒不詳）於 1939 年的一篇文章，反映了當時部份市民把大米囤積居奇的實況：「那些米是她在廣州失陷後三天裡分兩起買回家來的……因為憑她以往的經驗，她肯定地斷定了在這樣一個變動以後，米價一定會

⁸⁴ 黃若耶：〈時代動盪中的香港〉，載盧瑋鑾編：《香港的憂鬱 – 文人筆下的香港（一九二五 – 一九四一）》，（香港：華風，1983 年），頁 104。

⁸⁵ 文俞：〈可厭的都市〉，載盧瑋鑾編：《香港的憂鬱 – 文人筆下的香港（一九二五 – 一九四一）》，（香港：華風，1983 年），頁 193。

⁸⁶ 《光明報》，1941 年 11 月 9 日。

⁸⁷ 《星島日報》，1941 年 5 月 1 日。



飛漲起來的，而且香港以後也將成為上海那樣的「孤島」，物價一定更要格外高漲的……當然主要的她是預防米貴了之後免得自己去買貴米吃，但是卻也不無預備「待價而沽」的想頭。」⁸⁸由此可見，當時除了一些對國事毫不關心，終日遊玩的「富貴難民」之餘，更有不少人懶理其他人對糧食的需要，朝思暮想地盤算如何在動盪的時間，發一筆國難財。

5.3 令人歎息的社會百態

除了以上所述外，正當中國飽受戰爭衝擊，香港亦日漸受到軍威脅之時。香港社會則經常出現一幕一幕，令人搖頭歎息景象，這充份反應出香港社會的極端矛盾。例如，香港的「鹹濕小報」銷量奇高，在公共場所中「一些打扮筆挺的先生，捧著一張印刷惡劣的小報，恬然無恥的讀著淫穢的連載小說……」⁸⁹。少女在亂世中為了糊口，不惜打扮得花枝招展，站在路旁的汽車上落客處。她們「從幾毛錢到三四元的代價，公開的討價還價，為著了生活……」⁹⁰、「十四、五歲的小姑娘，以四角錢一小時的代價，供給任何人的蹂躪。」⁹¹。而不願犧牲色相的大多數，則為著生存而努力。在香港街上，可以看到「熱鬧的馬路邊睡滿鶉衣百結的乞兒，菜場周圍湧塞著負病孩的女人和憔悴的孩童，出賣著一仙兩仙的壞蔬菜……」⁹²而沒有能力負擔房租人們，當以為找到一個可以暫時安頓下來的地方時，一些「白皮膚的巨人」會無情的拳擊這一些露宿者，即使露宿者不斷反復

⁸⁸ 溫功義，〈米的故事〉，載盧瑋鑾編：《香港的憂鬱－文人筆下的香港（一九二五－一九四一）》，（香港：華風，1983年），頁152。

⁸⁹ 楊彥岐：〈香港半年〉，載同上，頁211。

⁹⁰ 加因：〈香港中秋之夜〉，載同上，頁231。

⁹¹ 屠仰慈：〈寄懷上海〉，載同上，頁158。

⁹² 同上。



地說：「不是我.....幫辦.....不是我」，但對方的亦不會手下留情⁹³。亦有一些露宿者，無助地躺著，他以粉筆在地上寫著：「誰使我流浪異地，誰使我家破人亡.....我慚愧不能自食其力，不能自力復此國家仇恨.....」⁹⁴。

「富貴難民」終日聲色犬馬，對國家存亡不聞不問。但身處街上的露宿者，報國之心仍然存左。上述各種社會情況，可以證明到在「七七事變」到日軍攻港這一段日子，香港社會矛盾對立，種種不同現象都反應了當時的香港，是個極端矛盾的社會。在這情況下，縱然社會有抗日救國的意識，但由於社會充滿矛盾，這會影響到社會有抗日救國的意識之餘，更做就不到培育香港社會對日軍侵港的意識的土壤。

⁹³ 文俞：〈可厭的都市〉，載同上，頁 196。

⁹⁴ 加因：〈香港中秋之夜〉，載同上，頁 232。

6. 日軍襲港前夕的香港社會

6.1 港人毫無戰爭意識的生活

《文匯報》資深記者唐海（1921-）曾經聽某一位元外國記者說，自 1937 年「七七事變」後，香港人的生活就像鴛鴦：「這種把頭部藏在沙內裝作看不見危險的鴛鴦生活，就是香港的人民生活。」⁹⁵不僅如此，在 1937 至 1941 年間，雖然日本經常對港英政府作出攻挑釁行為，但港府既不向外公佈之餘，又對日本的行為處處忍讓。結果，社會對日本的威脅一無所知，對日本侵略的戰爭意識自然大打折扣。

一位澳洲醫生曾經以：「莫不關心、遲鈍、自滿」⁹⁶來形容當時面對日本侵略威脅的香港社會，這個評論是十分正確的。1941 年，雖然「七七事變」已爆發了三年多，香港社會的戰爭意識依然十分薄弱。港府雖然對日軍的行動作了不少相應的部署，但港府依然把消息封鎖，只有極少數人知道，使社會普遍誤以為香港仍然十分安全。即使曾任立法局議員的李樹芬（1887-1966），也要在 1941 年 11 月時，才在任職副警司⁹⁷的朋友口中，才得悉加拿大援軍到港的消息⁹⁸。由此可見，由社會沒有接收到真實的情況，對日軍的威脅亦未能瞭解。在這情況下，社會上的戰爭意識，長期都處於低水準。

另一例子是，在戰爭前夕，港府不斷進行軍事及燈火管制演習，但居民對這

⁹⁵ 唐海：《毋忘昨天》（上海：上海文藝，1984 年），頁 53。

⁹⁶ 蔡榮芳：《香港人的香港史》（香港：牛津，2001 年）頁 231。

⁹⁷ 即副警務處長。

⁹⁸ 李樹芬：《香港外科醫生》（香港：李樹芬醫學基金，1965 年），頁 93-94。



些演習都甚為輕視。即使港府再三強調，會嚴懲於燈火管制演習不合作的居民⁹⁹，但各區仍不少居民把燈火外露，以香港的心臟地帶中西區情況最為嚴重¹⁰⁰。又另一例是，當時香港的報章，甚少報導有關日軍逼近本港的消息。反之，在開戰前兩個月的時間，占港聞版最多的篇幅，是一宗具貪汙桃色成份的「劉美美案」。在審訊過程中，由於劉美美（生卒不詳）的回答甚有桃色意味¹⁰¹，因此不少市民樂此不疲地，追看每天的港聞版報導。同時，當時的章每天都會有一至兩大版篇幅，去報導體育新聞，而港聞版的篇幅則有三至四大版而已。而報章上電影、飲食等廣告則包羅萬有，熱鬧非常。

而在社會中，仍然有不少人私利為先。例如的士司機、馬夫先後因薪酬問題，於 1941 年 11 月發起工潮¹⁰²。而米、柴的黑市價不斷被商人推高，逼使港府加強向市場加推米及柴，務求肅清黑市市場¹⁰³。

早於 1941 年中，港府下令強行疏散英籍婦孺，並勸喻華人自行疏散。由於英國婦孺社會上的總人口，只是占少數。因此，港府的撤僑行動，在社會中不被重視。就連港督羅富國也在「緊急狀態」下不忘娛樂，到娛樂戲院欣賞電影「騎兵四萬人」¹⁰⁴。在撤僑行動數個月後，被強逼撤退的英籍婦孺用不同的理由，不斷向港督要求取消撤僑令。最胡鬧的一次，發生於同年 11 月，身處香港的英籍

⁹⁹ 《光明報》1941 年 11 月 14 日。

¹⁰⁰ 《光明報》1941 年 11 月 16 日。

¹⁰¹ 葉德偉，《香港淪陷史》（香港，廣角鏡出版社，1984 年）頁 338。

¹⁰² 《光明報》1941 年 11 月 14 日、《星島日報》1941 年 11 月 14 日。

¹⁰³ 《大公報》1941 年 11 月 25 日。

¹⁰⁴ 《星島日報》1941 年 7 月 24 日



丈夫，向港督楊慕琦表示反對讓身處海外的妻子回港¹⁰⁵。兩日後，身處海外的英藉妻子，則向楊慕琦要求撤銷疏散令¹⁰⁶，讓他們回港。由此可見，不少人仍然想不到，戰爭即將不會來臨。

6.2 戰前一刻

港督楊慕琦亦於 11 月底及 12 月上旬，出席古畫展覽¹⁰⁷及香港富商何東（1862-1956）夫婦雙壽慶典¹⁰⁸等應酬活動。事實上，當楊慕琦參與何東夫婦雙壽慶典時，港府所有的情報都顯示，日本已在邊境集結了約 60,000 兵力，準備入侵香港。而港府亦發表了緊急疏散令，下令所有如無職務需要的人士，必須設法離開香港。可是，部份英美人士仍然不願離港¹⁰⁹，但荷蘭則宣佈從香港撤僑¹¹⁰。

在 12 月 6 日，即日本侵港前最後一個週末，香港市面熱鬧依然。楊慕琦依計畫出席一間位於窩打老道基督教會的遊樂會。同時，至於足球比賽依然熱鬧，甲、乙、丙三組聯賽合共有九場比賽，其中由米杜息對南華的一場甲組足球聯賽最為熱鬧，而足球裁判會更舉辦周年聯歡會，到晚上盡歡而散¹¹¹。而快活穀馬場方式亦照常賽馬，不少觀眾入場¹¹²。可是，各國商船於接到港府的撤退指示後，

¹⁰⁵ 《大公報》1941 年 11 月 4 日。

¹⁰⁶ 《大公報》1941 年 11 月 6 日。

¹⁰⁷ 《大公報》1941 年 11 月 29 日。

¹⁰⁸ 《星島日報》1941 年 12 月 3 日。

¹⁰⁹ 《大公報》1941 年 12 月 5 日。

¹¹⁰ 《光明報》，1941 年 12 月 5 日。

¹¹¹ 《大公報》，1941 年 12 月 7 日。

¹¹² Lindsay, Oliver, *The Battle for Hong Kong 1941-1945*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3.



全部於夜間啓程離港，港口除了渡海小輪外，其他船隻亦已停駛¹¹³。到了戰爭前一天，據《文匯報》記者唐海說，戰爭前的星期天，不少店鋪已經完成耶誕節佈置，並以「聖誕大減價」宣傳來吸引顧客。而不少青年當天，去新界遠足野餐。灣仔一帶的咖啡廳、酒吧、舞廳依然熱鬧，顧客中有不少為英軍及到港增援的加拿大軍人。而街道仍然充滿著不少途人及叫賣的小販¹¹⁴。可是在當日，由於不少身兼軍人的球員需準備軍事演習，因此當天所有足球比賽都需要改期，球迷們「高興而回，敗興而返」¹¹⁵。而電影方面，除了各色各樣的電影在各大戲播映外，一出由漫畫改成電影的影片《何老大》亦于當日上映。該影片並於報章上刊登頭版廣告，並以：「看完不笑，原銀奉回」¹¹⁶作招徠。另一出電影《英宮十六年》于皇后戲院公映，吸引了不少觀眾¹¹⁷。而當日最不尋常的一件事，就是所有戲院都於最後一出電影完結前，映出港府的通告，命令各軍政人員迅速歸隊¹¹⁸。可是，其他香港居民，仍然各自各活動.....

12月8日早上，當大部份香港人如常生活之際，日軍突襲啓德機場，並於邊境攻入香港。啓德機場受襲後，大量濃煙湧出，遠至彌敦道也能清晰可見。據唐海回憶，不少人在這一刻，依然認為這次是防空演習，更有人在街上說：「好逼真的防空演習啊！」¹¹⁹，而街上聽見最多的，就是途人互相查問日軍侵港「是

¹¹³ 謝永光：《香港抗日風雲錄》（香港，天地，1995年）頁189。

¹¹⁴ 唐海：《毋忘昨天》（上海：上海文藝，1984年）頁56-57。

¹¹⁵ 《大公報》，1941年12月8日。

¹¹⁶ 《華僑日報》，1941年12月7日。

¹¹⁷ 葉德偉，《香港淪陷史》（香港，廣角鏡出版社，1984年）頁284。

¹¹⁸ 唐海：《毋忘昨天》（上海：上海文藝，1984年）頁56。

¹¹⁹ 同上，頁57。



真的？還是假的？」¹²⁰。可是，港府沒有公佈任何訊息，而從九龍城走到尖沙咀碼頭的人，都說啓德機場附近的房屋都了中彈。而丟炸彈的飛機身上，都貼了兩塊「大紅的膏藥」。到了晚上八時，港督楊慕琦在播音台向全港發表講話，表示戰爭已爆發，並「請諸君努力，加以協助」，¹²¹期望中英人民能一起並肩作戰。到此時，香港人才如夢初醒，不得不接受戰爭爆發的事實。

由此可見，即使在日軍於啓德機場投襲炸彈的一刻，香港社會才如夢初醒，社會對日本侵港的戰爭意識，可以說是近乎沒有的。

¹²⁰ 同上，頁 58。

¹²¹ 《光明報》，1941 年 12 月 9 日。



7. 從社會的現象分析香港社會對日本侵港的戰爭意識

不少學者在分析「香港保衛戰」時，往往只著重於分析英軍的部署及戰術失誤，很少從社會之戰爭意識方面入手。事實上，一場戰爭中，戰術及部署固然重要，但民心一致是最重要的。以 1940 年英、德兩國的「英倫戰役」(Battle of Britain, 1940) 為例，當時英皇喬治六世 (King George VI, 1895-1952, 在位 1936-1952) 與伊莉沙白皇后 (Queen Elizabeth, 1900-2002) 帶領全國人民上下一心，志氣高昂地面對納粹德軍。因此，英國成功重挫納粹德國空軍，逼退他們的空襲，成功避免德軍登陸英國本土。

但是，從以上各章可見，由「七七事變」到 1941 年日軍侵港期間，香港社會對日本侵略的戰爭意識極為低下，特別是在日軍侵港前一段時間，不少人仍然以為在英國統治下，香港可以免於捲入戰爭的漩渦。雖然香港的工人、學生、電影界人士、殷商，以及由中國來港的文化人、演藝界人士都有參與抗日活動。但除了港府以及少數的文化界人士外，香港社會幾乎沒有意識到日本會侵略香港。在這情況下，香港在日軍侵略時，可以說是被殺過措手不及，社會各界驚惶失措地各自各地活動，未曾出現過上下一心，聯手抗敵的一刻。

7.1 港府的政策與香港社會對日本侵略的戰爭意識關係

綜觀整個香港社會，港府得到最多軍事情報，因此港府高層是完全意識到，日本終有一天會入侵香港。可是，戰前的港府，對華人採取愚民政策，雖然港府有吸納一些「華人精英」進入與權力，但港府始終都不相信華人，認為華人勢力



過大會動搖他們的統治。至於面對日軍威脅方面，港府主要採取綏靖政策，目的是儘量容忍及遷就日本，儘量維護英國在香港的治權及既有的利益，避免在兵源緊張的情況下與日本開戰。

在「七七事變」到 1940 年間，港府對日軍於邊境及香港海域附近的挑釁行為，通常採取容忍的態度之餘，亦不會向外公報。而為免引起日本的不滿，港府在戰前數年，儘量打壓社會中的抗日聲音。最佳的例子就是新聞檢查制度。港府在 1939 年起，對本地的中文報紙及電影引入各式各樣的檢查制度。凡是報導日本侵華的新聞，都被當局禁止出版，並以「□」或「×」遮蔽其內容。結果在報章上不少篇幅，都出現這種俗稱「開天窗」的情況。雖然在 1940 年後，英國對日本的態度漸轉強硬，但檢查制度依然如常運作。例如到了 1941 年 11 月 29 日，《大公報》報導香港進入戰時狀態，及 12 月 1 日報導輔政司史美(Norman L. Smith, 1887-1968) 勸喻香港居民撤退的新聞時。檢查當局亦把近半內容「開天窗」，弄致文章支離破碎，令讀者不知道港府要求香港居民撤退的原因。更令人稱奇的是，在日軍侵港後，檢查制度仍然「忠實」地運作，例如 12 月 9 日《光明報》報導香港首次被日本空襲的新聞，亦被「開天窗」。

港府的新聞檢查制度，原意是為免引起日本的不滿，減少其侵港的藉口。但檢查制度同時阻礙了香港社會，接收有關日本對香港有軍事上威脅的資訊，這使港人不知道香港正受日本之嚴重威脅，並樂觀地以為戰爭不會在香港爆發。由此可見，檢查制度是令香港社會，遲遲都沒有對日本侵略的戰爭意識。



另一個事實，就是從港府早於 1935 年便進行防務工作來看。港府確實有很高的日本侵略香港的意識，並早已預料到日本有機會侵襲香港港府。同時，在港的英國人，通常亦會認為在香港的日本人為間諜¹²²。而香港的英文報章，亦把日本稱為「敵」、「強盜」等。由此可見，港府對日本其實有高度的猜忌，瞭解到日本對香港的威脅。

可是，觀乎整個防務工作，包括撤僑行動，港府沒有要求華人參與之餘，亦未有讓全體香港市民參與之餘其中。例如，最初的設防工作十分秘密，而在早期的演習時，亦甚少要求全民參與。結果，使普遍居民都對演習抱不認真的心態。而在撤僑時，港府只安排英籍僑民以及極少量的「華人而有功於香港者」，撤退到澳洲及菲律賓等地。反之，其餘占了總人口 95% 以上的華人，港府只勸喻他們自行疏散。由此可知，港府的防務工作，是與民眾完全隔離，其目的只是維持統治而非保護香港居民。到了最後一刻，當日本空襲香港後約 13 小時後，港督才首次向全體市民講話，要求華人一起並肩作戰。但可惜，戰爭對香港社會來說，來得太突然。在無甚戰爭意識的情況下，市民有的只是惶恐失措，用盡方法去躲避戰火。港督的講話及要求，實在是來得太遲了。而唐海於香港戰敗後指出：「香港的戰爭，雖然是英國對日本的戰爭，但居民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是中國人……（港府）沒有進行必要的動員工作，人民和軍隊基本上是隔離的……因此，在戰爭中的市民，除了盡可能自管自躲避炮火外，甚麼都毫不相干了。」¹²³

¹²² 大宅壯一著、呂方節譯：〈謀都香港之行〉，載殷楊編：《嚴重的香港》，（上海：光華，1938 年），頁 8。

¹²³ 唐海：《毋忘昨天》（上海：上海文藝，1984 年），頁 75-76。



總括來說，港府雖然有意識地知道日本會侵略香港之餘，亦掌握到日軍方面的行動，可是，基於港府對華人的不信任，因此港府都開戰的一刻時，都與香港市民隔離之餘，更限制了香港社會接收日軍的消息，不讓香港社會知道日軍威脅香港之真相。結果，縱使港府有意識地知道日本會侵略香港，但港府的行動卻令香港社會培養不到日本會軍事侵略香港的意識

7.2 人口結構的複雜性與香港社會對日本侵略的戰爭意識關係

而香港人口的結構，其極端的複雜性亦大大影響了社會對日本侵略的戰爭意識。當時香港的華裔居民，大致可以分為原住民及戰爭難民兩大類別。所謂原住民，即是在「七七事變」前，已經在香港定居的人。而戰爭難民，則是在「七七事變」後，因為逃避中國國內的戰火而走難到香港的人。兩組不同組別的人人口，前者在 1939 年時約有 1,050,000 人，後者約有 700,000 人¹²⁴。由於背景不同的兩組人口都活在同一個社會中，因此在「七七事變」到日軍侵港的四年間，使香港社會充滿了矛盾。

7.2.1 香港原住民對日本侵略的戰爭意識

香港的原住民普遍於「七七事變」前，由廣東省移居到香港的人，他們文化程度普遍偏低，但較為單純善良，鮮有嚴重罪案發生¹²⁵。但由於他們長期活於殖民地統治下，雖然依然有民族意識，但國家觀念變得模糊。同時，雖然他們有民

¹²⁴ 當時港府在人口統計上有兩種做法，「方法A」是撇除因中日戰爭而移入香港的人口，「方法B」是計算所有香港的人口，因此港府得到頗為準確的難民數字。詳見*Annual Report on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progress of the people of the Colony of Hong Kong during the year 1939*, pp2-3.

¹²⁵ 陳潤培，《香港淪陷親歷記》（香港，紅出版，2008 年），頁 29。



族意識，並認同中國人的身份。而當中國被日本入侵時，亦基於民族主義，參與的抗日運動，救助受戰禍影響的人民。但在他們的心目中，戰爭是中日兩國之戰，而香港是大英帝國英國的土地。在其保護下，日本不會斗膽入侵香港。

至於香港的原居民，可以分爲一般平民及殷商富賈兩大類。香港的原居民，絕大多數都是貧窮的低下階層，他們的生活環境欠佳，多從事勞動工作。至於娛樂方面，電影、粵劇及足球運動，對他們來說是非常受歡迎。但當他們知道中國被日本人侵略的消息後，基於民族情緒，他們不但以行動去參與抗日活動，例如罷買日貨、拒絕爲日本人修船及搬貨外，亦願意節衣縮食，透過其所屬的工會如茶樓公會、海員公會等購買救國公債，支援中國的抗日戰役。同時，不少香港學生亦參與抗日活動，例如香港學生賑濟會、惠陽旅港青年會等募捐及回鄉救濟活動。由此可見，低下階層是願意爲抗國運動出力的。

雖然不少本地商人，對救國事業興趣不大。但本地的殷商富賈，低調踏實之餘，部份更願意擔當類似中國社會士紳階層的角色，並任華人社會與港府間的溝通橋樑。面對日本侵略時，他們透過旅港各邑同鄉會、商會等機構，去組織募捐、醫療等活動，去協助受戰爭影響的災民。例如在香港被購入的救國公債，多數都是他們組織的活動，而籌募得來。同時，一些港商在「七七事變」後，毅然取消總值 2,000,000 元的日貨訂單¹²⁶。部份商戶亦參與一些救濟活動，例如在 1941 年由宋慶齡（1893-1981）主持的「一碗飯運動」中，有酒家自願捐贈 2,000 碗炒飯，

¹²⁶ *The Hong Kong Daily Press*, September 5, 1937.



收益則捐助「中國工業合作運動國際委員會」，作為救濟基金¹²⁷。由此可見，雖然香港的原住民，未有意識到日本會侵略香港，但他們的民族情懷，是激起他們協助災民，投入抗日活動的原動力。

可是，在香港原住民中，亦有一些對戰爭麻木不仁，終日想著如何藉時局動盪，去發一筆國難財。例如不少業主瘋狂加房租，造成大量負擔不起房租的人露宿街頭。亦有不少人以低價把白米囤積，企圖在價高時把白米轉手圖利。而柴及米，亦分別有商人操控黑市市場。即使港府曾與米商商討解決黑市問題，但由於牽涉到米商的收益，因此他們無動於衷。

總括而言，香港的原住民，大部份都有抗日救國意識。可是，他們對日本侵略香港的戰爭意識，則近乎沒有。

7.2.2 南來文化界人士對日本侵略的戰爭意識

在南來難民方面，可以分為文化界、商界及一般平民三大類。他們唯一共通之處，就是在「七七事變」後，他們受到戰爭的影響，當上海、南京一帶陷落後湧到香港。

南來香港的文化人，主要包括文人作家、文化界人士、演藝人等。他們除了熱心推動抗日運動，文人作家及文化界人士透過寫作分析、漫畫、辦報等，讓香

¹²⁷ 《星島日報》，1941年8月1日。



港人瞭解到中日之戰的最新情況，並提升港人的抗日意識。最值得一提的是，唯一指出日本會侵略香港的，就是文化界人士，例如方秋葦曾在 1937 年〈從軍事上觀察香港〉一文中，分析出日本侵港的原因及可能性¹²⁸。另外，穆時英於 1938 年的〈英帝國的前哨：香港〉¹²⁹，以及屠仰慈於 1941 年〈歐戰變動中的香港〉¹³⁰亦有近似的分析。

文化界人士人是在香港社會中，唯一一群人意識到日本定會入侵香港的。惜孤掌難鳴。一來，他們只活躍於自己文化界的生活圈子，很少與社會大眾的低下階層接觸；同時，香港社會的文化水準普遍較為低落，人們絕少閱讀這一類刊登於學術期刊內的文章。在這情況下，縱然文化界人士有日本侵略的戰爭意識，但亦未能把之擴散到社會中。

7.2.3 電影業人士對日本侵略的戰爭意識

電影業人士，大約可以分為演員及製片商兩類。由於他們深知電影能有效地宣傳戰爭意識。因此，他們絕大部份都願意透過拍攝抗日救國電影，去宣傳抗日救國意識。同時，他們亦身體力行，參與義演，甚至購買救國公債。事實上，透過抗日救國電影，不但可以反映出電影業人士抗日救國的情懷，亦成功提升了香港社會的抗日意識。

¹²⁸ 方秋葦，〈從軍事上觀察香港〉，《東方雜誌》，第三十四卷，第十三號（1937 年），頁 169-170。

¹²⁹ 穆時英：〈英帝國的前哨：香港〉，載盧瑋鑾編：《香港的憂鬱 – 文人筆下的香港（一九二五 – 一九四一）》，（香港：華風，1983 年），頁 87-96。

¹³⁰ 屠仰慈，〈歐戰變動中的香港〉，同上，頁 221-229。



可以，對製片商而言，雖然他們曾拍攝不少抗日救國電影，亦參與義拍及購買救國公債等運動。但畢竟，他們始終為商人，始終以利潤為先。所以，當抗日救國為材的電影受歡迎時，他們便會濫粗劣造地拍攝這類電影。結果，大部份內容的內容都甚為牽強，因此漸漸不受歡迎。同時，鬼怪片熱潮從美國傳入時，他們的電影便會以鬼怪為題材。因此，抗日救國電影產量於 1939 年急跌。而為了吸引觀眾入場，製片商亦不介意在宣傳廣告中，更加入了不少與色欲有關的形容詞。製片商這一些行為，不但無助於提升香港社會的抗日侵略意識，而且還使港人在日軍大軍壓境的情況下，陶醉如聲色犬馬的環境之中。但公平地說，我們絕對不能否定的，是製片商確實有參與過救國抗日的活動，為抗日事業出力。

綜合來說，雖然電影業人士的活動，只集中於在香港宣傳抗日救國，而沒有意識到日本會南侵香港。然而，電影業的宣傳活動，衰然於 1939 年後急降，但電影可以讓社會大眾透過映像，瞭解日本侵華的事實，這對提升香港社會抗日的意識是正面的。

7.2.4 南來商人之生活對香港社會的日本侵略戰爭意識影響

最無戰爭意識，兼對推動抗日事業最無建樹的，就是由中國，特別是由上海南來，從事商業的「富貴難民」。最可怕的是，他們的思想及意識形態，與南宋時代人們偏安江南的情況，有極高的相似性。南宋詩人林升的一詩《題臨安邸》¹³¹，也能準確說明「富貴難民」在香港的生活情況及思想。

¹³¹ 《題臨安邸》詩文是：「山外青山樓外樓，西胡歌舞幾時休。暖風熏得遊人醉，直把杭州當汴」



雖然「富貴難民」們本身，都是受日本侵華的戰火影響而南逃香港。但在他們心目中，但最重要並不是國難問題，而是金錢及營商機會。「富貴難民」挾著巨額款項到香港，使香港的工業在這個戰爭時代，能夠加快地發展起來。可是，他們把在香港賺到的金錢，除了牢牢地放在自己的口袋之餘，亦讓自己去揮霍享樂，如光顧舞廳、去戲院、打麻將、賭馬、嫖妓等。當社會希望他們捐款救國時，這些本身都因戰爭而南逃香港的「富貴難民」，通常都視而不見，避之則吉。

但由於「富貴難民」在享樂時甚為豪爽，因此令香港市面的食肆、商戶、甚至司機，都對他們特別殷勤，使香港社會都染上阿諛奉承之風之風，拜金主義亦日漸濃厚。到日本入侵香港前夕，各大報章亦充滿了飲食娛樂的廣告，吸引這一些豪客光顧。由此可見，「富貴難民」為香港帶來的，只是奢華、揮霍、享樂為先的生活方式。這一些東西，使香港社會沉醉於聲色犬馬的氣氛，而無視日本侵港的威脅。

7.3 對 1937 至 1941 年間香港社會對日本侵略的戰爭意識之分析

7.3.1 香港社會各界對日本侵略的戰爭意識情況

綜合各章所可見，於「七七事變」到日軍侵港的一段時間，香港社會極為複雜，貧富間的對立，思想與目標之差距，都使社會充滿著極端的矛盾。總體來說，雖然香港社會普遍有著一定程度的抗日意識，但對日本侵略香港的意識則嚴重不足。



經過對 1937 至 1941 年間香港社會的探究，當時有日本會侵略香港意識的，就只有港府高層及個別由中國南下的文化界人士。至於大多數民眾，包括香港社會的貧苦大眾、殷商、電影界人士，以及中國逃來的難民等，雖然沒有都意識到日本不但侵略中國，而且還會向英國挑戰，侵略香港。但他們都思國憂民，十分積極地參與抗日救國活動。

而由上海到香港的「富貴難民」，以及一些在動盪中企圖透過投機炒賣而發國難財的香港人，則兼對抗日事業最冷漠之餘，亦無意識過日本會侵港。

7.3.2 港府未能提升香港社會對日本侵略的戰爭意識

港府從英國方面及各情報都得悉，日本很大機會入侵香港。因此，港府早有準備，於 1935 年便開始部署防務工作。原本可以有充足準備，是足夠應付日本的挑戰。

可是，先別說戰爭時在戰略上的失誤問題¹³²。長久以來，港府對華人諸多猜疑而且不信任，結果港府在進行整個防務工作時，毫不考慮把華人排除於外，並沒有向香港社會宣佈任何有關防務工作的消息。此外，爲了儘量維持現狀，以免對香港失去統治權，港府更透過新聞檢查等政策來討好日本，禁止反日宣傳。結

¹³² 據前線軍人 Kenneth Cambon 在其回憶錄所說，港日之戰並非如駐港英軍司令瑪律比少將所講的順利。事實上，在日軍攻港時，英軍各連甚少聯合行動及協調進行反擊，整個英軍指揮給前線士兵的感覺是命令矛盾百出、各組織異常混亂。此外，戰術嚴重失誤，如在日軍登錄港島前，只派少量兵員到柏架山的主要制高點等。都是英軍迅速敗陣的軍事原因。參 Cambon, Kenneth 著，吳迪譯，《香港淪陷與加拿大戰俘》（北京，同心，2005 年），頁 10-13。



果，新聞檢查制度妨礙了香港民眾，接收有關日本侵港侵華的消息，使香港社會未能提升對日本侵略的戰爭意識。此外，港府與華人的疏離，欠缺互信，使港府未能得到占人口 95% 以上華人的民心，一起同心協力對抗日本之餘，更被日軍有機可乘，巴結了社會中不少貧民，以及低級華藉員警組成第五縱隊，從香港內部進行顛覆活動。最後，港人在港府的瞞蔽下，不知道日本對香港早已構成威脅，使他們想也沒想到日本會侵略香港。例如日軍侵港後，在街道上最常聽到的「是真的，還是假的？」為例，便知道在香港社會中，幾乎沒有任何日軍侵港的戰爭意識可言。雖然開戰後，港府曾經要求中英人民並肩作戰，但被日本突襲後陷於恐慌的港人則各自各地逃生，並迅速唾棄港府。而港府則在沒有民心的支持下，與日本決一死戰，最終迅速潰散收場。

由此可見，港府未能借著社會的抗日救國情緒，提升香港社會對日本侵港的戰爭意識，這是港府於港日戰爭迅速戰敗的主要原因。

7.3.3 報章報導手法失實影響香港社會的日本侵略戰爭意識

不少南來的文人如薩空了、鰲韜奮、梁漱溟（1893-1988）等人，都在香港從事辦報事業。無可否認的是，文化界人士在港透過辦等事業，向香港社會提供有關戰爭的訊息。可是，在報導戰爭消息時，當年的報章文化，通常都是誇大失實，這亦影響到香港社會，甚至在前線軍人所接的的訊息之準確性，甚至作戰情緒。

在英軍退守港島當日，雖然撤退過程中無人命傷亡，但被迫丟掉大量彈藥，部份戰船亦損毀，影響了作戰能力¹³³。而一名曾參與戰爭的加拿大皇家步槍團（Royal Rifles of Canada）士兵Kenneth Cambon（1923-）在回憶錄中形容，由九龍退守的英軍「面容憔悴，疲態不堪」¹³⁴。然而，《大公報》於翌日的報章上，則以「九龍英軍安全設防，軍火儲備充足可長期堅守」¹³⁵為題報導這消息。。另一例子是，據日本的戰史紀錄，日軍到達市區前，除了需要在被英軍破壞的道路搬運大炮，吃了一點苦頭外，他們根本不廢吹灰之力，於12月10日佔領大埔，並在大埔設立據點¹³⁶。翌日，日軍只花了三小時，便不流血地攻佔了金山¹³⁷。亦在沒有任何英軍抵抗下，佔領青衣島。罔12月12日，日軍在擊斃約30名英軍後，便佔領了全個九龍¹³⁸。Kenneth Cambon指出，當年「日軍快速地向前推進，通過了新界……（英軍）這個地區在兩天之中根本沒做任何抵抗。」¹³⁹可是，《華僑日報》於12月11日則說：「我（駐港英軍）軍隊重創敵軍……我軍抗戰甚勇，印度部隊及炮隊，已表現自己為一等勇士。」

更甚者是，報章不斷報導國民政府的軍隊即將進入香港，並於後方圍剿日軍。例如《大公報》於12月12日大字標題說：「本港形勢大好轉，我生力軍已

¹³³ （日本）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室著；天津市政協編譯委員會譯：《香港作戰》，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頁99-130。

¹³⁴ Cambon, Kenneth著，吳迪譯，《香港淪陷與加拿大戰俘》（北京，同心，2005年），頁9。

¹³⁵ 《大公報》，1941年12月13日。

¹³⁶ （日本）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室著；天津市政協編譯委員會譯：《香港作戰》，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頁99-100。

¹³⁷ 即現在的金山郊野公園一帶。

¹³⁸ （日本）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室著；天津市政協編譯委員會譯：《香港作戰》，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頁124。

¹³⁹ Cambon, Kenneth著，吳迪譯，《香港淪陷與加拿大戰俘》（北京，同心，2005年），頁9。



開到，敵後路完全切斷。」¹⁴⁰在英、日兩軍於港島開始了街頭巷戰時，《華僑日報》於12月23日報導：「我軍克深圳，遊擊隊入九龍。」¹⁴¹但事實是，雖然蔣介石的確答應派兵支持香港。但事實上，到了香港淪陷的一刻，國民政府的軍隊從來都未曾在香港出現過。這一些誤導訊息，不但使香港社會對戰爭抱有不必要的期望，使香港社會對戰爭變得過份樂觀之餘，就連前線軍人亦受影響。Kenneth Cambon說，在港島進行戰役時，他與戰友們「聽說蔣介石的軍隊正在向九龍接近，我們大大地鬆了一口氣……幾架異樣的飛機從我們的上空飛過，我們不禁歡呼起來，向他們揮手示意。當飛機上的日本駕駛員掉過機頭，朝我們擲炸彈時，一定以為底下的人是一群瘋子……」¹⁴²。

由此可見，雖然文化界人士透過辦報，向香港社會提供有關戰爭的訊息。可是，當年報章的失實報導，不但使香港社會對日本侵略的意識影響外，亦擾亂了前線軍人的作戰。

7.3.4 社會文化低落妨礙日本侵略的戰爭意識於香港社會散播

除了港府外，就只有文化界人士方面有日本侵港的戰爭意識。文化界人士透過精心獨到分析，指道出了日本侵港的主要原因。可是，香港社會的文化水準十分低落，人們多看小報而絕少閱讀學術期刊。同時，文化界人士只活躍於自己的生活圈子，他們亦把日本對香港的威脅之分析文章，刊於如《宇宙風》、《東方雜

¹⁴⁰ 《大公報》，1941年12月12日。

¹⁴¹ 《華僑日報》，1941年12月12日。

¹⁴² Cambon, Kenneth著，吳迪譯，《香港淪陷與加拿大戰俘》（北京，同心，2005年），頁23。



誌》等學術期刊。在這情況下，即使他們的分析如何準確，但始終沒有機會提升香港社會對日本侵港的戰爭意識。縱然文化界人士有日本侵略的戰爭意識，但亦未能把之擴散到社會中。

7.3.5 社會只著眼於抗日救國而忽視自身受日本的威脅

香港社會的普遍人士，例如香港本身的貧苦階層、部份的小商戶、殷商，以及南來香港的演藝界人士，他們對抗日救國是十分熱心的。香港社會的貧苦階層，他們樂意把辛苦賺來的金錢捐出，支持中國從事抗日活動。若經濟上不許可的，亦會透過一些行為上的表達，例如罷買日貨、拒絕為日本人服務、街頭塗鴉等方法，去表達他們對抗日活動的支援，而沒有經濟能力的學生，則舉辦募捐活動之餘，更派人到中國協助有需要的居民。而演藝界人士、殷商、部份小商戶等，除了透過捐款、購買救國公債等活動外。亦透過各宣傳管道，向香港社會散佈抗日救國意識。

可是，當中國飽受戰火洗禮時，香港仍然長期處於安穩太平的局面¹⁴³。再加上，香港是為英國殖民地，中日間的戰爭，雖然牽動了香港華人的民族情緒，但對長期受英國殖民統治的香港華人而言，戰爭就只是中日兩國之間的事，英國及香港不可能牽涉其中。因此，社會各界集中的，往往只是中國受日本的戰火洗禮，而不會考慮到香港本身亦受日本的威脅。

¹⁴³ 由 1931 年的「九一八事變」到日本揮軍侵港，相隔了 10 年多。



7.3.6 社會腐化令香港社會難於建立對日本侵略的戰爭意識

「富貴難民」把奢華、揮霍的生活，悉數由上海帶來香港。這一些舉動，令香港社會變得腐化。這些「富貴難民」，雖然本身亦是日本侵華的受害者，但他們為香港帶來的，不是什麼抗日救國宣傳、道出香港受日本威脅等東西，而是最鼎鼎大名的「百樂門舞廳」。以另一角度看，這些「富貴難民」的確令香港的經濟，在動盪中有異常的發展。但他們的奢華作風、紙醉金迷的生活，卻令到香港人耳濡目染，社會變得更自私及更為崇尚拜金主義。

當然，除了「富貴難民」外，不少香港民眾亦都朝思暮想，思考如何在動盪中瘋狂加租、囤積居奇等，去發一筆國難財。在這情況下，香港的社會風氣變得更為腐化及崇尚拜金。在這情況下，香港社會的抗日救國情緒不但得不到這些人的支持，而且更令香港社會更難建立對日本侵略的戰爭意識。

8. 總結

總括而論，由「七七事變」到日軍侵港的一段時間，香港社會的確無甚日本侵略香港的意識可言。其原因最主要社會各界在港府的隱瞞下，對於香港受日軍的威脅情度一無所知。整個社會中，最早預計到香港會受日軍入侵的，是香港政府。可是，基於港府的自保心態，因此港府選擇討好日本，並掩蓋香港真正所面對的威脅，使港人誤以為在英國統治下，香港不受日本威脅，導致香港社會對日本侵略沒有任何意識。

做成香港社會對日本侵略意識這樣低下的原因，第一是基於港府對華人之不信任，兼且對日本的綏靖態度。使港府在防務及軍事工作上，完全與社會市民隔離之餘，新聞檢查制度亦使社會，掌握不到日軍對香港威脅實況。結果，港府未能借著社會的抗日救國情緒，提升香港社會對日本侵港的戰爭意識。

其次，報章的報導手法，往往不盡不實，使社會在各個階段，都誤以為香港的情況樂觀。這不但使香港社會對日本侵略意識有負面的影響外，亦影響了前線軍人作戰情緒。

第三，文化界人士方面雖然有日本侵港的戰爭意識，但由於他們刊登分析文章的地方，一般甚少接觸到。再加上，文化界人士與普遍市民接觸不多，因此未能把日本侵略的戰爭意識，擴展到社會各界中。

同時，社會上普遍的民眾、本地的殷商、演藝界人士，以及南來的作家雖然十分積極投入抗日救國工作，他們救國之心，確實是值得人們尊敬的。可是，由於早於香港定居普遍民眾，長期受英國殖民統治。因此，雖然因為民族情緒，會牽起香港社會的抗日救國意識，但社會亦普遍以為，戰爭是中日兩國之間的事，身為英國殖民地的香港不會牽涉其中。因此，他們的活動，只集中於在香港宣傳，而沒有意識到日本會南侵香港。

最後，有經濟實力的一群，特別是這些「富貴難民」，則只重私利而漠視公利之餘，亦把不少鄙習帶都香港，使香港社會染上奢鄙之風，對社會的抗日及日軍侵港意識有嚴重的負面影響。這事情反映出，金錢能使人失去基本的人性。筆者對文人黃若耶的一席針對「富貴難民」諷刺的說話，十分認同，他說：「人都這樣說：中國弊在窮人太多，有錢的太少。這麼看來，反覺得這現象未始不是中國之福呀！」¹⁴⁴。

在研究「香港保衛戰」時，筆者再三認為，除了要從港府軍事報防及各方戰術方面進行研究時，亦需要對香港社會，特別是香港社會對日本侵略的意識方面作研究。若能從社會方面入手去研究，亦很容易理解到港府在「香港保衛戰」迅速潰敗的原因。

¹⁴⁴ 黃若耶，〈時局動亂中的香港〉，載盧瑋鑾編：《香港的憂鬱－文人筆下的香港（一九二五－一九四一）》，（香港：華風，1983年），頁106。



參考書目、文章

書目

（日本）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室著；天津市政協編譯委員會譯：《香港作戰》，北京：中華書局，1985。

Cambon, Kenneth 著，吳迪譯，《香港淪陷與加拿大戰俘》（北京，同心，2005 年）。

余慕雲：《香港電影史話》，（九龍：次文化堂，1997 年）卷二，〈三十年代〉。

余慕雲：《香港電影史話》，（九龍：次文化堂，1997 年）卷三，〈四十年代〉。

吳楚帆：《吳楚帆自傳》，（香港：偉青，1956 年），上冊。

李樹芬：《香港外科醫生》（香港：李樹芬醫學基金，1965 年）。

唐海：《毋忘昨天》（上海：上海文藝，1984 年）。

殷楊編：《嚴重的香港》，（上海：光華，1938 年）。

張連興，《香港二十八總督》（北京，朝華出版社，2007 年）。



曹克安：《家居香港九十年》（香港：星島，1986 年）。

梁柯平，《抗日戰爭時期的香港學運》（香港：香港各界紀念抗戰活動籌委會有限公司：香港各界文化促進會有限公司，2005 年）。

陳湛頤編著：《日本人訪港見聞錄（1898-1941）》，（香港：三聯，2005 年），下卷。

陳潤培：《香港淪陷親歷記》，（香港：紅出版，2008 年）。

葉德偉，《香港淪陷史》（香港，廣角鏡出版社，1984 年）。

蔡榮芳：《香港人之香港史》（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1 年）。

魯言，《香港掌故》第十二集（香港，廣角鏡出版社，1989 年）。

盧瑋鑾編：《香港的憂鬱 – 文人筆下的香港（一九二五 – 一九四一）》，（香港：華風，1983 年）。

盧豫冬，〈香港的戰略地位〉，《中華畫報》，第 78 期，1939 年 6 月號（1939 年）。

薛后：《香港電影的黃金年代》，（香港：獲益出版，2000 年）。



謝永光：《香港抗日風雲錄》，（香港：天地，1995 年）。

謝常青，《香港新文學簡史》（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1990 年）。

薩空了，《香港淪陷日記》（北京：三聯，1985 年）。

Endacott, G.B. , *A History of Kong Kong*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Endacott, G.B. , *Hong Kong eclipse*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Gillingham, Paul, *At the Peak : Hong Kong between the wars* (Hong Kong : MacMillan, 1983).

Welsh, Frank, *A history of Hong Kong* (London: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1993).

Whitfield, Andrew, *Hong Kong, Empire and the Anglo-American alliance at war, 1941-45* (Hong Kong :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1).



報章／文章

《大公報》，1941 年 11 月 4 日、11 月 6 日、11 月 20 日、11 月 25 日、11 月 29 日、12 月 2 日、12 月 3 日、12 月 4 日、12 月 5 日、12 月 7 日、12 月 8 日、12 月 12 日、12 月 13 日。

《光明報》，1941 年 11 月 9 日、11 月 14 日、11 月 16 日、11 月 24 日、11 月 29 日、12 月 5 日、12 月 9 日。

《星島日報》，1938 年 11 月 14 日、12 月 6 日、1941 年 5 月 1 日、6 月 23 日、7 月 24 日、8 月 1 日、11 月 14 日、12 月 3 日。

《華字日報》，1937 年 11 月 7 日。

《華僑日報》，1941 年 12 月 7 日、12 月 11 日，第二次刊、12 月 12 日。

Annual Reports on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progress of the people of the Colony of Hong Kong during the year 1939.

CO129/562/23, Koshu Koshi Kabushiki Kaisha : Suspected Activity as Japanese Agents, April 2,1937 to August 25,1937.



CO129/563/11, Sino-Japanese War : Political Situation, ff5, pp 1-46.

CO129/563/13, Sino-Japanese War : Comments at Cabinet Meeting, August 17,1937.

CO129/567/4, Traffic of arms to China and Japanese air-raids on Kowloon-Canton Railway, ff3-8.

Copp, Terry, “The Defence of Hong Kong December 1941”, *Canadian Millitary History*, Volume 10, No.4, (Autumn 2001).

Henderson, Christine, “A marriage of convenience: Britain's relations with China: as influenced by the Hong Kong connection and the diplomac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940-1945”(Unpublished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1981).

Lindsay, Oliver, *The Battle for Hong Kong 1941-1945*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5) , pp 3.

Ma, Yiu Chung, “Hong Kong’s Responses to the Sino-Japanese Conflicts from 1931-1941” , (MPhil dissertation,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1).

The Hong Kong Daily Press, September 5,1937.



方秋葦，〈從軍事上觀察香港〉，《東方雜誌》，第三十四卷，第十三號（1937 年），
頁 169-170。

盧豫冬，〈香港的戰略地位〉，《中華畫報》，第 78 期，1939 年 6 月號（1939 年）。